

清史知识丛书

# 『通玄教师』 汤若望

〔联邦德国〕恩斯特·施托曼著  
张秉彬、张福海译 魏永昌校

《清史知识丛书》向您展示：一代知识的长廊，社会风情的画卷，各式人物的奇闻，斗争风云的变幻。使您：丰富知识，启迪思想，广智。

清史知识丛书

# 『通玄教师』汤若望

〔联邦德国〕恩斯特·许尔曼著

达素彬(联邦德国)张

魏永昌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清史知识丛书》编辑

主编 罗明

副主编 王俊义 匡继先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孔祥吉 王俊

匡继先 张

郭成康 黄爱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89709

1 189709



清史知识丛书

“遁玄教师”汤若望

[联邦德国] 恩斯特·斯托莫 著  
达素彬 (联邦德国) 张晓虎 译  
魏永昌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960毫米32开 印张：4.125 插页3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60 000 册数：1-1 000

ISBN7-300-00620-5  
K·66 定价：2.10元

## 序言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但象中华民族这样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民族在世界上却为数不多。每个民族都热爱自己的历史，以自己的历史为荣，而中华民族在尊重、学习自己历史方面，有着独特的传统。千百年来，历史教育一直是我国知识教育的重要内容，上自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平民，莫不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历史教育。长期的熏陶，潜移默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凝聚力，即使在我们民族的苦难时期，我们的先人也大都坚守民族气节，以炎黄子孙为荣。

“历史无用”论是不正确的。诚然，历史不能解决穿衣吃饭，不能直接增加物质财富，然而，它却能开拓人们的精神境界，给人们以启迪，使人们温故知新，鉴往知来，在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的文化素养方面有其独特的意义。从长远的观点看，谁也不应当否认历史在当前四化建设中重要的、持久的作用。

清朝（1644—1911）二百六十八年的历史，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一时期，世界和中国发生了许多对后代影响深远的事

变。清朝入关定鼎燕京之前四年，即1640年，欧洲的英国发生了克伦威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世界的一部份已进入了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变革，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而中国却正在进行长达几十年的厮杀，重演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改朝换代。清王朝取代明王朝统一全国之后，集中注意力于加强国内的统治，闭目不看世界。当它感到外来威胁时，不是奋起直追，寻求富强之道，而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以为这样便可求得安全保障。诚然，当它国力强盛，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力量尚不足以冲破古老的堡垒时，它是安全的，但它离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却越来越远，越来越落后，尽管它在国内的统治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却不能保障王朝的命运，也不能保障民族的安全。历史是无情的，愚昧者必将受到惩罚，厄运悄悄地接近这个巨大而古老的帝国，它的大门终于为外国侵略者的大炮轰开，中华民族的灾难日益深重。许多志士仁人，为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安乐，努力探索，奋斗牺牲。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无情地揭露了清朝的腐朽统治。的确，清朝末年，清王朝确实成为历史前进的障碍，不打倒清朝政府，中华民族便无复苏的希望。但是，一般说来，在革命风暴时

期，对前朝历史的剖析，难免偏颇。当暴风雨过去之后，平心静气地探讨一个时代的得失，可能会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清朝二百多年的历史，有其重大的失误，也有它成功之处。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能维持那么长久，论武力，元朝的统治者比清朝的君主更强悍，蒙古骑兵曾经使世界发抖，但元朝君临天下却不足九十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封建王朝能够建立对边疆地区的稳固统治，能够象清朝那样比较妥善地处理同北方各民族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外戚、宦官、朋党、藩镇割据，象恶性肿瘤一样，造成许多强大王朝肌体衰竭，也造成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的苦难，而这些在清代是看不到的，有之也很淡薄，不足以引起政治上的危机；在中国历史上，开国之君及其以后的第二、三代皇帝，一般都能奋发有为，至四、五代（有的更短一些）以后，便大都骄奢昏聩，无所作为，但清朝前期的几乎所有皇帝，却多能图谋远略，勤于治事。可见，清朝的历史既有教训可供汲取，也有经验可供借鉴，熟习这二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对于了解我国的国情是大有好处的。

近年来，文艺界以清朝历史为题材的小说、戏剧、电影、电视陆续出版和上演，吸引了大量读者和观众，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同时也给

读者和观众留下了许多问题，历史工作者有义务给予解释和回答。

为普及清史历史知识，增进读者对清代也就是对我国昨天的了解，提高文化素养，陶冶思想情操，使清史研究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我们决定出版《清史知识丛书》。这套丛书既不同于专深的史学专著，亦有别于文艺作品和历史演义。列入丛书的作品，都力求是有科学性、知识性、可读性的鲜明特色，内容要依据史实，不随意杜撰。表达要短小精练，新鲜活泼，富于情趣。丛书的选题范围，包括自满族兴起至辛亥革命清朝覆亡为止的有清一代历史，凡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典章制度、边疆民族、社会风俗、学术流派、书画名著、宫廷掌故等等，一人一题或一事一题，每本五、七万字，读者在紧张工作之余，用一两个晚上的时间，即可读完，所费无几，不亦乐乎！

早在五十年代，吴晗等老一辈历史学家即着手历史普及工作。在吴晗倡导下，出版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以后又有许多普及读物问世。我们不敢企求取得象前辈们那样的成功，但我们愿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走下去，而且力争在新的时期，有所创新，有所前进。如果我们的工作能够对精神文明建设有一砖

一瓦之得，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的辛苦和汗水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报偿。

我们期待着作者的支持，更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正。

罗 明

1987年11月





中国皇帝御前的天文学家亚当·沙尔（即汤若望）

ERNST STÜRMER

MEISTER  
HIMMLISCHER  
GEHEIMNISSE

W 43

VERLAG ST. GABRIEL, Mödling  
STEYLER VERLAG, St. Augustin

1980

# 目 录

一、引子.....	( 1 )
二、星官.....	( 3 )
三、“无可挽回了”.....	( 8 )
四、让野蛮狗去死!.....	(14)
五、一个坦诚的花招儿.....	(18)
六、伪装的送煤人.....	(26)
七、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29)
八、锦衣卫里的替罪羊.....	(36)
九、紫禁城内的女信徒.....	(40)
十、皇帝忘了吃饭.....	(45)
十一、“你们这些没有用的家伙”.....	(48)
十二、盗贼和反叛者.....	(52)
十三、矿石铸冶火炮.....	(54)
十四、太监们的报复.....	(58)
十五、他万岁! 万万岁!.....	(67)
十六、两位耶稣会神父: 背信弃 义的战俘和奴隶.....	(74)
十七、皇帝的朋友.....	(79)
十八、“痘神娘娘”的打击.....	(95)
十九、镣铐下.....	(99)

二十、“我承认” .....	(108)
二十一、你留下永久的荣誉 .....	(112)
关于《通玄教师汤若望》 .....	(115)

## 一、引子

一位天主教的牧师，凭借其德国嗓音，跻身为中国皇帝御前的最高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一位虔诚的耶稣会神父，为龙椅上的君主用矿石铸冶了大炮；一位教会的传教士，为了潜入国家的监狱，装扮成衣衫褴褛的送煤人，这都是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因此，赫尔曼·舍海巴在其书《中国人》内所描绘的关于亚当·沙尔的生活是很恰当的，书中写道：“这简直是一部电影的材料，其内容足以使好莱坞的一切关于中国题材的影片为之逊色。”

亚当·沙尔（1592—1666）来自科隆的莱茵河畔。这位揭开天文秘密的大师和满族皇帝的朋友，竟然被皇帝亲密地尊称为“玛法（老爷爷）”。亚当·沙尔敢责备不受任何约束的国家主人和最高统治者；他勇敢地抗击了匪徒和反叛者；他富于戏剧性的生活有难以想象的起伏跌宕的情节。他曾被授以荣耀的头衔和显职，又遭到无耻的侮辱和诽谤，晚年在半身不遂和衰老时却被指控为巫术、叛逆罪、邪教的布道者和散布天

文学的谬说。由于上述种种指控，他差点儿被议处肢解凌迟，但老天爷保佑，他终于幸免于难。

在中国档案里，亚当·沙尔以“汤若望”的名字出现。他充当天子的顾问，位居极品，并担任为皇帝修改中国历法的钦天监监正。在天主教的历史上，他以一位最伟大的传教士业绩而载入天主教的史册。

在中国四千多年的历史上，没有哪一位外国人能获得如此高的权力和荣誉，无人能与亚当·沙尔相比肩。修道士南怀仁曾评价道：“沙尔对皇帝的影响比全部督抚和贵族加在一起的还大。神父亚当的名字在中国，要比任何一位欧洲著名人物在国外的名气都大。”

## 二、星官

为避开睚眦众目，天子（中国人对皇帝的称谓）总是深居于三层高墙之内实行统治。在北京城的中心，人们称之为北城的地点，有一个24公里长、15米高、10米宽的墙，这是一座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墙。北城的范围包括在三层高墙，五千御林军以及大象保护之内的皇宫。

第一层墙所包围的皇城，内有一处天堂般的花园，小山间湖水荡漾，另有赛马场、鹿苑和岩铃羊。皇城的第二层墙包围着紫禁城，内有皇仓、御衣处、太医院、庙宇、图书库、戏台。紫禁城内居住的人员，包括一万名太监和两千名宫女，这些人全部服务于皇帝和皇后。皇宫内设十五衙门，在衙门内任职听差的太监，都来自寒门，而宫女却大多来自富贵之家。人们称这些宫女是有福之人，实则是些形同终身监禁的囚犯。依地位和文化被选中的女孩子，在皇帝大寿或春节的吉庆日子送给天子，她们以后再也无法离开内宫。她们跪着向皇帝递送奏折，陪同皇帝下棋，奉膳，充当侍婢或陪皇后聊天遣遣，或为皇子、

公主充当内侍。

紫禁城里是内宫，内宫被第三层墙所包围，这里是皇宫的核心部分，皇帝下榻之处。金碧辉煌的皇宫内供放着国家的圣物——龙椅，上面端坐着统治世界（当时中国的提法，实指中国，下同）的天的代表者。当时文化发达并拥有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国，是一个封闭的、严禁外国人进入的世界。在中国人看来，外国人都是野蛮人。

一位勇敢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打开了通向中国的缺口，他不惧杀头和酷刑，在1601年进抵至龙椅的影子那么近的禁地。一位编年史学者形容道：“连商人和旅行者都休想挤到的地方，天主教的教士们却能找到路。”

沿着利玛窦的足迹，十字架的使者们在中国传道布教。作为天意的代表，皇帝必须顺天承命。中国人特别注意顺天意，生活要遵循上苍的神圣秩序，与大自然和睦相处就是他们的宗教。他们认为如果人与天之间的和睦关系受到阻碍，痛苦和灾难便随之而来，和平与秩序也就不复存在了。

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的利益来说，最重要的是公众与私人的生活都要按照日月星辰的运行秩序行事。一切都必须由历法来决定，哪怕是诸



如谁想做件衣服、买牛、理发、洒庭扫除、丧葬、请客、洽谈、掘井、婚娶、开茶馆之类的小事，都要经过占星决定，查看是否合于黄道吉日。无论是国家大事或是家中小事，都由历法最终定夺。

皇帝虽号称世界的统治者，却往往无法自主，因为皇宫内的星相家能够左右其意志并控制他的行为。

在中国，纂修纪时历是国家的首务。皇帝、历算家和人民都必须认真观察星象并遵从天意。如果日食或月食果然在预测的时间发生（星象官员必须将日月食观测结果在事先密封呈奏），便被视为国家的大吉之年而受到人民象过节一样的欢庆。如果历法家们的计算有误，则被认为是国家的可怕忌日，因此每年颁行历法是国家一件极为重要之事。遗憾的是在几百年里，历法屡屡出错，谬误充斥于历算方法之中。当耶稣会士利玛窦在中国站稳脚跟的时候，中国恰好需要消除纪时历以及历算法中的错误。

利玛窦可凭借的则是自己对天文、数学、物理、地理等学科的知识和智慧，他正是依靠这些才进入中国的。他明白这是一次良机：在中国通过观察肉眼所及的天象，从而使人们看到一个肉眼难及的天——上帝。于是，他向罗马教团的首

脑发了一封紧急求援信：“火速派遣天文学家、懂得历算学的教团成员到北京来！”

他在1605年的求援信中，还向教团领导报告了他所知道的其它情况，即中国皇帝雇用了200多人计算历法，皇宫外的城区建有两座耗资巨大的观象台，用以观测和解释天上的星座，一座是按照中国的天文学规定修造的，另一座则取法于阿拉伯的天文学，但在日月食的计算上都有错误。中国和阿拉伯的天文学派曾心怀愧疚地表示，他们一直十分严格地按照前人建立的规定进行观察，这两种制度的差错是因为历法已有几百年未加改动，因而是难以信赖的。据此，利玛窦十分恳切地邀请罗马教团派遣能够应付改革历法的天文学家到北京来。利玛窦在信中写道：“我肯定地说，只需要天文学家。因为几何学、钟表匠、等高仪我都非常熟悉，这类书籍我都有，我的世界地图、表、地球仪、等高仪以及其它仪器，都是由我一手指导生产制造的。诚如上述，才使我在这一里获得最伟大的数学家的名声。尽管我缺乏关于天文学方面的书籍，但我有一些葡萄牙的历书和杂志，所以仍可以比皇宫中的中国和阿拉伯学派的天文家更为准确地预测日月食。然而，如果我说明因没有必要的书籍而无法修改历法，历算家们将会不信任我。为此，我恳请教团领导从欧洲

派遣一两个天文学家给我，无论他隶属何种国籍，让他们带来所需之书，那时我们便可以完成历法的修改，而这些工作对我们的圣教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 三、“无可挽回了”

几乎在利玛窦的求援信到达“永恒城（罗马）”——一封信从北京到达罗马要好几年——的同时，有一个来自莱茵河畔的青年贵族，他的名字叫约翰·亚当·沙尔·封·白尔。他骑马通过“人民门”，到达了梯坝河畔“七山城（罗马的另一称谓）”。他从1607年起就决心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天，而不是地。他后来却成为中华帝国最伟大、最崇高的天文学家。

关于上述情况，当这个来自科隆的小伙子在叩响德意志学院的大门而要求入学时，该院的瑞乃尔第院长当然无法预料。

当时瑞乃尔第院长不仅拒绝其入院，并且去信横加责备科隆耶稣会的负责人：“你们犯了一个令人心烦的错误，就是关于约翰·亚当·沙尔·封·白尔。这位不速之客是个名符其实的小孩子，他进入德意志学院的条件还远不成熟，怎能出现如此的过失，实在令人费解。”

然而，这位1592年5月1日在科隆的“信徒教堂”附近出生、时年仅十七岁的亚当·沙尔并非

一个市井无赖。他出身于古老的莱茵河畔的一个贵族之家，具有杰出的智能，而且受教于莱茵河畔最有名的学校。在科隆的“三王冕中学”，他受到传统的古典教育，对于最典雅的拉丁文在书写、阅读以及会话中都毫无障碍。

沙尔被拒之校门外之事，引起了一些对外关系上的麻烦<sup>①</sup>。他找到了一位尊贵的说情者，就是巴伐利亚的费尔南德大公。大公从波恩致函耶稣会领导人阿克维瓦，极力保荐这位年轻的贵族入校，尽管沙尔并未达到规定的二十岁入校年龄。

耶稣会的领导人迫于大公之情面，只得睁一眼、闭一眼地同意了。这样，德意志学院就破例接收了这位才十七岁的人。1608年7月24日，他收到了该院的红校袍。

三年以后，他打点起全部行装——一顶毡帽、一件深棕色的薄棉大衣、一件长袍、一件红内衣、一条深棕色的布裤子、一双黑袜子、一双拖鞋、一件衬衣和一双皮鞋——搬到了罗马耶稣会的圣·安德雷奥修道院。

作为一名见习修士，他闲暇时经常去访问监

---

<sup>①</sup> 指罗马德意志神学院和科隆大主教区之间的关系，因沙尔被拒绝入院而紧张。

狱和医院，安慰刑事犯人和照顾久病衰老的病人。他以莱茵河人特有的热情，使这些愁容满面的人现出了微笑。

那时，他的思想时常飞到遥远的、仙境般的中国，听说耶稣会士利玛窦在那边受到天子的格外敬重。这位德国见习修士很佩服已在北京去世了的利玛窦的那种无比勇敢精神，利玛窦凭借其数学和天文学的智慧，欲使权势无限的中国皇帝也信奉宗教。他的这些智慧引起了中国学者们的惊叹，使他们倍感新奇。

约翰·亚当·沙尔，一个自然科学的天才，是否能继利玛窦之后，也同样担负起这种历史使命呢？他俯视着世界地图，诚惶诚恐地这样自问道。

1614年末的一天，一位在中国住了两年之久的传教士来到罗马，他叫尼可劳斯·特立高尔特（金尼阁）。他热烈地向基督会学院发出求助的号召，从那时起，沙尔就到了“无可挽回”的境地。在见到了这位佛兰德（荷兰）的信仰使者之后，这个二十二岁的德国人就迫切地想去中国传教。

1617年，亚当·沙尔在神学和自然两个学科结业，当了一名新的神甫。他受领导的委派，前往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并且在那儿踏上了期待已

久、始自波峰浪谷之上的远东之行。

“好耶稣”号船于1618年4月16日、即复活节的星期一起锚开航，到东方去传教。船上有636名象鲑鱼那样挤坐在一起的人，其中有22个决定到中国去的宗教使者，约翰·亚当·沙尔·封·白尔即是其一。

在可以避风却久有死亡恶名的圭亚那海岸，卡波维尔底七岛的南端，发生了一场大瘟疫，一种散发恶臭的高烧（疟疾），使船上一多半的海员和旅客成为病人。从年纪最小的船员到船长，不时有人发出一阵阵呻吟和哀叫，使尚未染病者为之战慄。当时，处在高烧之中的沙尔，不由地想起在老家科隆的那种“黑色死亡（即瘟疫）”，曾无情地吞噬了许多富有才华的生命。他在神智昏迷的时候，耳际一直萦绕着家乡教堂上的丧钟之声。

7月13日，有一艘返回葡萄牙的帆船途经这座在海上漂浮的医院时，他赶紧向罗马修书一封。他一星期之前就开始发烧，因虚弱不堪而悒郁不乐。他无法克制自己的绝望情绪，在信中告诉那些同学们：“请按照一个死者那样为我祷告吧！”

高热的传染病夺走了45个牺牲者，其中有5人是受聘到中国的那22位传教士中的人。当时，

如果没有这些传教士竭尽全力地救治，死亡者可能超过200人。在得到救治者万分感激的人之中，有一位来自瑞士的全欧洲著名医生、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名叫邓玉函。我们在下文中还要述及此人，他后来担任皇家天象台的研究者，而此时在船上从事他的医学专业，给大家吃药、抽血。

7月25日，一些海员兴奋异常地喊醒了全船仅存的那些神志昏迷者：“看见好望角啦！”

1618年10月4日，“好耶稣”号船终于抵达了旅行的目的地——印度的果阿。这是一段极为艰难的旅程，在1580年至1640年之间往返于里斯本和果阿的323条船中，沉没海底的船只决不少于70条。沙尔和他的同志们抵达了印度的圣地，而且比他们预计的要早一个半月——一般需要七个月——他们兴奋极了。果阿被称为“东方的罗马”，这里的耶稣会大主持以圣经里的诗篇作为欢迎词：“欢迎你们在主的名义下到来！”

然而，又有两名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死在了果阿。

果阿是去往中国的中转站，传教士们在这里听到了不得不停步的凶讯：中国皇帝于1617年下令将境内的耶稣会士驱逐出境。万分沮丧的沙尔只得乘船前往澳门，这是个处于中国大门口的葡萄牙领地。在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三桅帆船遇



到了那种通向地狱的飓风，遭此厄难之后，他于1619年7月15日到了澳门。然而，通向中国之路阻塞了。中国皇帝在1617年2月14日颁发的贬谪耶稣会士出境的谕旨是有效的，在印有玉玺的圣旨上特别指斥了两个人的名字：“谕各省府周知：驱逐高一志、庞迪我及其同事出境回国。他们传佈异端邪说，以异教破坏百姓安定，密谋挑起臣民骚乱和反对朝廷的叛乱。朕晓谕各省府，无论何处之传教士，均予以监管并押送广州，驱逐出境，遣其回国，以使其不再干预中国事务。我们曾对这些外国人委以官职，皆因为误传他们是来中国服务，说庞迪我及其同事能协助我国纂修历法。朕严令驱逐他们出境回国，实乃中国之大幸之事。”

然而，这道谕令对于传教士来说却是极大的不幸和悲痛。

## 四、让野蛮狗去死！

“诛灭传教士！”传教士的死敌、礼部侍郎沈灌于1616年咬牙切齿地发誓。他要歼灭这些耶稣会士，并且，丑诋他们为“丑恶的老鼠”。他还指斥传教士策划了叛乱，而且屡屡出入御前，毫无道理地控告耶稣会神父，说他们散布荒谬的教义，不允许人们膜拜祖先，诱使人民起义并充当秘密宗教组织的首领，企图推翻皇帝的统治。

沈灌认为，如欲长治久安，就决不能姑息迁就这些野蛮人，必须将他们放逐八万里（用德文讲，就是把传教士流放到月亮上去）。怒不可遏的沈灌等不及告状的奏折上达皇帝，便自作主张地在南京对全部教徒进行了一场搜捕。由于沈灌毫无道理的行动无法在文官或廷僚中找到同情支持者，他只得采取另一行之有效的贿赂方法，即以家财去行贿廷臣和势力极为强大的太监朋党。

波尔，即徐光启大学士，这位宗教领袖（后来朝廷的阁老）勇敢地挺身而出，替耶稣会士们辩护：“陛下，臣恳请陛下严格审查耶稣会士们关于宗教、哲学、统治术、经济、天文、物理、

数学和医学的著述，倘若在逐一审查中发现神甫们有谋反叛乱或颠覆政权的企图，我自请与这些传教士一并治罪和流放。”

但万历皇帝听信了被沈灌收买唆使的太监朋党的谗言，致使皇帝索性对此撒手不管。然而，太监们那些使皇帝心烦之言充耳不绝，他便在1617年签发了将传教士们驱逐出境的谕旨。此谕已见上述，按照现代电报的表达方式，等于说“传教士出去！”

在北京的两位耶稣会神甫庞迪我和熊三拔被很客气地送到广州，他们在那儿锁铛入狱。

而在南京，沈灌处置两个神甫曾德昭和高一志竟如重罪犯人一样，在他们的脖子上套上铁链押走。沈灌宣称：“杀掉你们再容易不过，但我还是给你们留条性命。”他下令让执刑差役肆无忌惮地痛打神甫。

粗鲁的行刑者用棍子打神父们的脚和腿，直至皮破血流，使高一志一个月也无法站立。神甫们的衣衫破碎，双手锁铐，脖子上戴枷；象野兽一样被关在囚笼里押送到广州。一路上，他们饱受那些幸灾乐祸者的嘲弄，在广州的监狱里见到了北京的同事。四名神父都在1618年1月被驱逐到了澳门。

庞迪我、熊三拔、曾德昭和高一志都被驱赶

出国境，侥幸留下还在工作的十四名耶稣会士中，包括8名神父和6名同志逃脱了天子差役们的搜捕，在安全的隐蔽地点藏了起来，等待着时来运转。

他们企望着这场由沈灌发难追捕教徒的狂风逐渐减势，有两名耶稣会士甚至藏到了利玛窦墓穴的祈祷室里。

危难之时见人心。这些耶稣会士在官吏和老百姓中都有许多勇敢的知心朋友，他们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把这些来自遥远西方的天之骄子藏了起来。

隐蔽中的传教士们并不甘于清闲，而是专心致志地阅读中国文学和文化方面的书籍。

当教会的死对头、发誓要消灭中国基督教的沈灌在1620年丢官罢职以后，传教士们小心翼翼地走出了掩蔽之所。他们象被猎之物一样，小心试探着走到大庭广众之中，因为皇帝当初发布驱逐令时已将他们的居留证件扣了起来。

1620年是三位帝王共同执政之年：1573年即位的万历皇帝于1620年驾崩之后，关心时政者拥立万历帝的继承人泰昌（光宗），希望他从管理紊乱的泥坑中拯救国家，而耶稣会士们则期待着皇帝撤消驱逐令。

但是，泰昌皇帝只统治了几个星期，贪污腐

化成性的佞臣们深怕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便用毒水鸩杀了皇帝。

1620年至1627年间是天启皇帝当政，他是一个经不起恫吓的小孩子，除了花天酒地之外，他的生活乐趣就是做木匠活儿。皇帝权力的疆绳握在权倾一时的阉党首领魏忠贤的胖手里，传教士们嘲讽道：“没有魏忠贤的允许，皇帝连脚都不敢动一下。”

魏忠贤是一个刚愎自用和肆无忌惮的暴君，为建立自己的威望，下令在全国为他修祠建庙，顶礼膜拜。在官道上，他乘坐御辇，并有携火统的侍卫、军队和乐队护送，朝廷的要员们、诸如六部尚书乃至宰辅们都必须葡伏路边。一次，他巡视皇陵，竟然乘坐在御辇之上，下令在所过的长达十二里路上铺满黄纱。

在魏太监的恐怖统治下，阿谀奉承者得以鸡犬升天，昔日地位不高、追捕教徒的沈灌，就在1622年荣升要职。但没过多久，他又由于复仇欲和阴谋过于显露而失宠罢官，从此再也无法为患作孽了。耶稣会士们深深松了一口气，敌人被推翻了，沈灌的毁灭性打击，也没能将利玛窦和他的同志培植的教会连根铲除。

虽然传教士们并没获准居留，但他们却能在不惹眼的情况下，继续从事他们的圣徒工作。

## 五、一个坦诚的花招儿

被狂热驱使极想到中国来的亚当·沙尔在澳门呆不住了，雷雨尚未过去，他已于1622年夏天跟费根雷多、瑞培尔罗和迪奥斯（李玛落）几位伙伴一起换上中国人的外衣，踏上了通往中国腹地之路。

从那时起，亚当·沙尔取名为“汤若望”，“汤”与“（亚）当”发音相近，而“若望”则与“约翰”谐音。这四位耶稣会士在烈日的暴晒下，乘帆船航行在湛江和北江的上游，他们在肮脏的甲板上挤作一堆。这几个贸然入境者直到一座广东与江西的分界岭前停船登岸，然后又踏上了一条山岭小径。这条路上往返着许多挑夫，他们挑着许多货物过山，担子上满是袋子、捆包和篮子。商品交换在他们中间十分活跃。

神甫们租了马匹、轿子和挑夫，千辛万苦地登上山口，在途中的一个客栈内休憩。他们无须害怕匪盗，因为这条山路上一直有巡逻的官兵。以后，他们通过了山谷之间的一个峡口，这个象大门一样的峡口通往江西。

越过界岭，他们再次乘船而行。几个月后，寒季来临，为了抵御寒冷，他们都穿上了大棉衣。

亚当·沙尔在最寒冷的时候抵达北京，时值1623年元月25日，正巧全北京城的人都在为过春节而忙碌。

行色匆匆的人们无暇顾及这位外国人，他通过了北城的西南门，找到利玛窦生前买下的那栋房子，这所旧居全靠一位忠诚的信徒保护，才在那场大搜捕时免遭厄运。在挂满灯笼和遍贴对联的喧闹胡同里，汤若望（即亚当·沙尔）并不惹人注目，但没有获准居留的神父是十分危险的，他的那些朋友为此颇费踟蹰。

两位宗教领袖，波尔——徐光启和列奥——李之藻，想出了一个狡猎的花招儿。

当时，在北方有满族人，亦称鞑靼人。满族的骑兵冲破了长城，威胁明王朝的安全。昏庸的朝廷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抵抗是好。

于是，波尔和列奥向朝廷建议：让我们去澳门购买葡萄牙制造的大炮，请耶稣会神甫们担任军事顾问，而这些神甫是一些“有礼貌、文化和很能干的人”。这一建议得到兵部和皇帝的赞同，然而耶稣会神甫们不同意。

神甫对他们的朋友说：“我们是上帝的人，

不是皇家的炮兵。”

列奥狡黠地笑着说：“你们无须真去充当生活中的军事顾问的角色，而是在舞台上。这完全是一个花招儿，就象一位裁缝的针，一旦衣服缝好，针也就不要了。你们必须以军事顾问为名，去取得皇帝允许的中国居留权，一经达到目的，再用笔去换掉剑则不是难事……”

兵部官员对神甫们素有好感，便同意经办此事。于是，他们请来两位耶稣会士，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你们相信葡萄牙人会卖给我们大炮吗？第二：你们能否操纵使用火炮？

神甫们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而对第二个问题却予以否定：“我们是为信仰而传教，不是为战争。”

兵部不理睬这种早就料到的回答，便下令在全国寻找传教士，并让他们到北京来。

一位神甫后来写道：“根本不需要长时间寻找，因为寻找者都知道他们藏在哪儿。”

在北京，传教士们都领取了留居的证明。十二年后，一个耶稣会神甫写道：“他们很平安而且受人尊敬地生活在北京，关于大炮、战争或者满族人的问题，再也无人向他们提及。”

历史学家卓兹·哈·顿解释道：“这个花招的最精彩之处，在于这些神甫居然如此认真地将



这一角色扮演到最后一分钟。”

朝廷的容忍态度，等于撤消了对他们的驱逐令。

局势缓和后，亚当·沙尔从暗中转向公开。

他和户部尚书交上了朋友，这位尚书被天文学知识迷住了，尚书恳请耶稣会士预测月食，结论是在1623年10月8日。这位朝廷要员对常出差错的中国大统历和阿拉伯回回历习以为常，而沙尔的预测却如期兑现，使他万分惊喜地惊喊道：

“我相信中国拥有这个世界上的二位科学和道德方面最有才能的人，一位是利玛窦，另一个就是您。如果您能按照中国的礼仪收我为弟子，我将不胜荣幸。”

沙尔不同意收这位弟子，婉言谢绝了。尚书既无缘拜师，便答应向皇帝争取一笔天文学研究经费，以此作为酬答，也被沙尔拒绝了。

沙尔不得不暂涉旁务，必须开始学习汉语，天文研究只能抽空进行。不过，这也足以使他完成了两本天文学著作。

教团领导人对沙尔刚刚起步的工作是什么态度呢？他们向罗马的报告中有这样的评语：“他颇具思维才能，善于判断事物，但外交手段平常。他的经验有限，科学上很有建树，性格也不错，气质十分开朗乐观，但不够成熟。他善于待

人处事，自己有著述能力，不过目前还不适宜当领导。”

在北京的见习期满后，亚当·沙尔于1627年被派到西安府当牧师。

西安府是陕西省的都会，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始发点，它联系着中国和西方。西安是重要的贸易中心，到处是美丽如画的民族服装和毛巾，还有骆驼、马、骡、满载货物的大车和来自近东、中东的商贾。他们给中国带来葡萄干、地毯、棉布、萨拉逊马刀、磁砂、碧玉、金刚石和马匹；当他们离开西安时，主要带走丝绸、布匹、大黄、麝香、茶叶、瓷器等，他们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与中国人进行贸易。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还必须象使团一样向皇帝进奉贡品，皇帝也给他们赏赐和礼物。

这座伟大的拥有大量宫殿、花园、剧场、乐园的城市，当时已失去了旧日的繁华景象，显露出衰败的迹象。在保存下来的伟大历史文物——这里曾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之中，有一块石碑，它对在中国的教徒们有难以估量的意义。许多人往往指责基督教是：一种新的教义。而“新”，对传统的守旧意识极为浓厚的中国来说，不啻是一种骂人的话。在西安府发掘出土的聂斯脱利派的781年的纪念碑，无可置疑地证明了基

督教和天主教早在一千年前就已经进入了中国。

德国牧师在1627年到达西安府时，当地群众对这位教士怀有很深的抵触情绪，人们用恶语来迎接他。

沙尔不顾众说纷纭，我行我素。不久，这个心地善良的人无论在豪华府邸和穷家小户之内，都找到了朋友。很快，他在那儿盖起一座教堂，起初还担心受到官府的反对，但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相反地，并不相信主的官员们不仅表示赞同，而且拨了经费修建这座信徒们的教堂。就象着了魔一样，入教的信徒越来越多，在很短的时间内，沙尔吸收发展了50名教徒，他的大名远播西安府和陕西省境之外。一个镀金的十字圣架，耸立在教堂的顶端。自古以来，首次毫无阻力地允许一个十字架置于大庭广众之中。在中国人看来，它是一个愚蠢的标记（相信一个被杀的上帝，在他们眼中是件可笑之事），但好奇的人们仍然从远近慕名而来。

就在亚当·沙尔出任西安府牧师的时候，千里之外的北京城人心惶惶，国内也引起一阵骚乱（按：指清军进攻）。

天启皇帝即位于三王共掌权柄的1620年，他将大权交给了意志软弱、禀性乖戾的魏忠贤，自己却因酗酒享乐过甚而死于1627年。他被一群只

知发国难财的流氓恶棍所包围，官以钱得，中国被这些太监闹得濒于崩溃。不愿受贿的官员横遭迫害，国家已是腐朽透顶，危在旦夕。

饥饿的人民靠吃草根和树皮为生，怨声载道，盗匪和野蛮部落趁机在全国大肆劫掠。

天启皇帝死后，太监魏忠贤想让他宠信的党羽为其鼓吹称帝，但阴谋未能得逞。

当16岁的崇祯皇帝即位后，给了祸国殃民的、曾将天启皇帝置于股掌之上的魏忠贤一根绳索时，魏立即绝望地领悟了这位新帝的意思，便自缢而死了。于是，皇帝削夺了臭名昭著的太监朋党的权力，抄没了他们趁国难而搜刮的财宝。

崇祯是一个头脑机智、忠心耿耿的年轻人，他起用了一大批受魏忠贤迫害而谪官罢职的旧臣，委以要任，波尔（徐光启）即是其一。他从利玛窦的时候起，就是耶稣会神甫们最好的朋友。1629年，他升任礼部尚书，观象台即隶属他的管辖之内。他敦促皇帝对耶稣会神甫们委任，以完成早就该实现的历法改革，并下令印刷亚当·沙尔这位德国传教士早在天启年间就完成了的两本有关月食的著作，这些著作用极白的纸印制，并且送给皇宫几部。

皇帝对欧洲的天文学印象甚佳，就召见波尔并派他进行历法改革，同时让两位在北京生活的

耶稣会士邓玉函和龙华民出任钦天监官员。

邸报向全国传谕了这个消息，各省传教士的地位立即身价百倍。早在崇祯皇帝的祖父万历皇帝时开始下达的驱逐传教士命令，自此被取消了。

这个调任皇家天文台的伟大学者邓玉函神父，我们在上文里曾经介绍过，就是当时向中国运送包括亚当·沙尔在内的耶稣会团的“好耶稣”船上，那位救治瘟病患者生命的医生。

约翰·特仁（邓玉函）是当时非常有地位的天文学家，也是现代天文学开拓者约翰·卡普兰和伽利略的朋友，当时无人在修改中国历法上能比上他的才华。然而，他刚刚开始搜集材料和数据，就不幸去世了，这一噩耗对耶稣会神甫们是一大灾难。

一些官员想起了在西安府极有声誉的三十八岁的亚当·沙尔，除他之外还有谁能代替特仁神父呢？1630年6月29日，皇帝下令让亚当·沙尔和亚柯·布鲁（即罗雅各）负责修改历法。急使将委任状郑重地送到西安城内，顿时引起传教士们的骄傲和兴奋，因为“他们中的一个人”被指定去修改历法，这件事使传教士们兴奋异常并大摆宴席以示庆祝。地方官府的官员们给亚当·沙尔预备了轿车和远行途中的食品，并且坚持送出很远，喋喋不休地为他祝福。

## 六、伪装的送煤人

亚当·沙尔于1630年秋天到了京城。他既不敢浪费时间，也为了避免在中国和阿拉伯两个学派的天文学家中引起骚乱，便躲进一处耶稣会的隐庐内，与罗雅各神父默默无闻地工作。在1631至1632年间，他们的朋友波尔徐仍兼任钦天监之职，徐可以将这两位助手的工作情况或成绩直接报告皇宫。

官居礼部尚书的波尔徐已入选为阁臣，他当时已是“皇帝之下的第一人”。

亚当·沙尔并不仅仅观测星象。一天，他用煤灰涂满自己的脸、膊和脚，穿上破衣服，背着一袋煤走出门。沉重的煤包压得他象挑夫一样跛足而行，他经过许多街巷向监狱走去，竟没有被人认出来。他的膝盖在颤抖，并非仅仅因为煤包沉重，而是他自己也不怀疑这是用性命在冒险。他暗暗地向上帝再次祷告，然后深吸一口气，向着站有看守的监狱大门走去。他那些象是喃喃自语的答话使对方无法完全听懂，看守者只听清了“煤”和“监狱长官”的意思，就揣测这个背夫

是给监狱官员们送煤的。看守弄不明白，为什么夏天里监狱官员还需要燃料？大概是聪明人想得远吧。送煤人恭敬地鞠了一躬，就从看守者身边走进监狱。在一间暗无光线的地牢内，关押着和虱子、老鼠同居的囚犯，他在这间地牢里见到了要找的人——依格纳爵·孙（音译即孙元化）、米夏埃·常陶，孙元化是一位军队的统领，一直率领军队在满洲的地界处与鞑靼作战。他明知无望却仍恳请朝廷下发拖欠已久的军饷，掌管此事的官员置之不理，却将钱款暗入私囊。一天，他属下的三千军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哗变，朝廷下令对此进行血腥镇压。他作为一名教徒对御旨进行了反抗，千方百计地企图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其努力失败，被命令连同他的校尉米夏埃·常陶（音译），这人也是教徒，一起回北京。满族首领曾对他许以高官诱降，他严斥道：“我决不做叛逆的罪人。”他遵从皇帝的谕旨，自己去刑部投案自首，刑部议处斩首罪。

一天半的时间里，亚当·沙尔在臭不可闻的监狱里，隔着墙上的一个小洞，与两位恪尽臣职的英雄一起等待着行刑的最后时刻。沙尔解释道：“我和我的朋友徐光启为了营救你们而竭尽全力，然而我们的努力无济于事。皇帝虽然同意施恩，刑部官员却大加反驳，认为如果违抗圣旨

者不予以杀头严惩，道德和秩序就会毁灭。”

两位临刑者很感宽慰，因为有机会向一位冒着生命危险给他们送来最后一顿圣餐的牧师忏悔。

离开这座死牢时，牧师又不得不扮演脚夫的角色。他壮起胆子悄然走过监狱看守时，见看守已换了岗。他后背上的煤口袋就成了通行证，不过现在已成为空囊。为了防备卫兵的愚蠢盘诘，这位送煤者开了个玩笑：“我已经为狱卒们毫不客气地‘生火’<sup>①</sup>了。”

---

① “生火”是德文中一句开玩笑的话，意即毫不客气地教训某人。



## 七、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沙尔和罗雅各秘密地进行了中国的历法改革，日子过得也不错。当他们离开从事研究的那所安静孤独的小房子而公开进行天文工作时，耶稣会址旁盖起一座天文学的研究机构，培训那些受过欧洲人辅导的中国天文学者。这时，声名扫地的中国和阿拉伯的星象家勾结在一起，妒火中烧地对德国传教士不择手段地报复。这个反对亚当·沙尔的阴谋策划者，是一个老牌的江湖骗士，名叫魏公。这个令传教士们愤怒的敌人，撒下天罗地网捕捉耶稣会神甫，企图夺回修改历法的职事。

沙尔当时在一封信里写道：“魏公在朝廷里那些有权势的同党们，对我们这些享有荣誉的历法改革之事恨之入骨。我们这些外国人修改历法，朝中反对派们却通过他们的影响和金钱去多方帮助我们的敌人。”

魏公给皇帝递了奏折，请求将修改历法之职转派给一位同样能干的本国人（譬如象他本人）：

“倘若野蛮人比中国人更受优待，则是皇帝的永

久耻辱。”

当时，耶稣教会在中国的最大祐助者就是尚书徐光启，他是皇帝的右手。波尔徐掌管天文台对亚当·沙尔的憎恨者是一种限制，但沙尔还是建议，最好让存心捣乱的魏公也进入天文学研究机构，也让他分享历法研究成果的荣誉，以使其收敛劣迹。徐光启同意了 this 请求，但警告说“披上羊皮的狐狸仍然是狐狸”。果然，魏公拼命支使神甫们干活儿，却将工作成绩窃为己有，波尔徐深知其人，不幸而言中。魏公还是一个乱嚼舌头的老头子，四处散布神父们的坏话，竭力表白自己的功劳。

于是，波尔徐从防御转向进攻：他好几次在日月食即将出现的时候，特意邀请国内那些对基督不满、而且自愿参加修历的人到北京来，目的是进行一场和平安静的比赛，让天上的星儿去判定谁是正确者。

所有的竞赛者都必须象耶稣会神甫们一样，向皇帝报出自己的预测数据。为了集中起来观察预报结果，每当日月食即将出现的时候，他们都聚集在观象台上。中国的天文家们每次都被事实证实是谬误的，他们自惭形秽，便都悄悄溜走，只有魏公死不低头。

1633年，波尔徐的去世使情况骤然变化。起

初，魏公虽然有朝内朋党的大力支持而亟欲补钦天监职事的空缺，皇帝却决定按照徐光启的临终遗嘱，将钦天监之职交到了教徒彼得（即李天经）的手中。彼得李博士虽然怀有良好的愿望，但他很快暴露出是一个优柔寡断、不坚定、甚至不堪一击的人。他企图取宠于所有的人，回避每一个必须作出清楚判断的决定，按照沙尔的说法：“他不是修改历法成果的父亲，而是继父。”他天性怕事，总希望相安无事，因此处处屈服后退、俯首贴耳。时过不久，他就只能跟随那位狂妄自大、自称是其尊师的魏公的笛声翩翩起舞。

李天经请朝廷批准曾是自己死对头的魏公再建立一个天文台和一套有关机构。

彼得李的软弱无能，使皇帝深感其无力胜任修历工作。皇帝转而宠爱颇为自负的魏公，为他和他的同党修建了一座价值昂贵的天文台，并从国库为这些人支取很高的薪金。

相形之下，沙尔和罗雅各的生活以及研究经费就少得可怜。徐光启临终前曾在私蓄中给他们留下部分应急的储蓄，以使他们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但他们的靠山一倒，很快囊中匮乏，捉襟见肘。波尔徐在病榻上曾告诉皇帝，耶稣会神甫们只有不足以糊口的微薄薪俸。然而，他们提高

薪俸的希望近乎渺茫。

沙尔对皇帝的怪吝做法并不介意，而且十分诙谐地认为他的同名入“亚当（上帝创造的男入）”的情况也并不比他强多少。他说：“我和亚当一样汗流浹背地生活，这可以锻炼体魄和灵魂。”

1634年，亚当·沙尔送给天子一些天文仪器，以使皇帝在遮护甚严的皇宫内有机会亲自判断天文学界的争议。他也可借此向皇帝提供资料，换取适当的酬劳。在送去的仪器中，有一件裹在一个黄缎包裹内的带有镀金支架和铜附属物品的神奇望远镜，还有一座石质镀金的浑天仪，这些仪器都可凭借星座来观测夜晚的时间。此外还有一个日晷，它的中央指针是一条金龙，水平底座是用大理石制的柱脚。皇帝对这些仪器十分欣赏，下令安置在皇宫的第一道宫墙内。

遗憾的是，这种安排并非神父的意思。他们的目的是在统治者的眼皮底下安置一个观象台，这样就可以供皇帝随时使用，不必再很麻烦地到远处查询。

沙尔利用一次日食即将到来的机会，鼓足勇气向皇帝建议，最好将这些仪器移置于紫禁城的第三道宫墙之内。结果出人意外，使耶稣会神甫们惊讶得张口结舌，皇帝不但同意此事，并且坚

持由传教士亲自过问仪器的移放工作。外国人进入最神圣的禁地，这是亘古未有之事，平时只有内监和宫女才能涉足此地，这事本身就是一枚伟大的勋章。事毕，沙尔和罗雅各神父被请至龙案上，享受了一顿舒爽美味的招待。

后来，皇帝利用这些仪器观测到的日月食情况，令人信服地表明，只有耶稣会神父们每次提供的数字都是对的、切合实际情况的。

然而，魏公以及同党们并不甘心。一天，沙尔告诉皇帝，朱庇特星（木星）<sup>①</sup> 将从两颗阿赛仑星的中间穿过，然后再沿着原路返回。这对迷信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极为不祥的预兆——京城或皇宫内将要发生火灾。

为了取媚内心惊恐的皇帝，魏公散布说耶稣会士们的预测是骗人的鬼话，扬言按照他们的数字和测算，根本不会有引起火灾的朱庇特星中贯阿赛仑星之事。

皇帝特地派了两名宫内管理天文的太监去观察究竟，结果是沙尔的预测被证实，但太监却是魏公的党羽，竟然编造出相反的情况报告皇帝。

一次偶然的意外事故，居然挽救了欧洲天文学家的声望和信誉。星象的真实情况被隐瞒谎报

---

① 罗马神话中的主神。

了一天半之后，北京城内某处的火药桶突然失火炸裂，炸死50多人，毁坏了许多房屋。这次飞来的横祸可把太监们吓坏了，他们追悔莫及，便承认了为掩人耳目而进行的恶作剧真相。

经过七年的工作，耶稣会士们最后完成了历法的修改。这些科研成果包括150多本著作，但公之于众则是在很久以后。

1638年，沙尔神父的同志罗雅各神父去世了。罗雅各神父是一位十分能干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工程师。时隔不久，皇帝为了纪念他的贡献，特意向耶稣会神甫们馈赠了二千两银子。并为表彰沙尔开拓性的历法改革方面的突出贡献，将其每月俸银提到十二两。

比全世界的财富显得更为重要的是皇帝的纪功碑，在中国，最高的赏赐莫过于皇帝御制的碑。碑文出自御笔，被工匠们用金色颜料描在刻有龙纹装饰的碑上，御制碑文是：“朕表彰和保护天的意旨”。四个边走边打鼓吹号的承宣官，从皇宫走向耶稣会住地。纪功碑的交送者是一位朝中要员，他的马后跟随着京城内的高级官吏，路上行人一律叩伏地上。一个骑兵中队殿后护送；人群很快越聚越多。

亚当·沙尔感动地恭候在耶稣会分会的屋内，他与李天经博士、身着官服的天文台官员和

学习天文的学生们以深深的鞠躬相迎。碑先放在耶稣会房子的前厅，后移至门前的影壁处立放。

以后，中国凡有天主教传教士居住的地方，都有这块皇帝纪功碑的复制品，供人们观览和地方官吏朝拜。

“朕表彰和保护天的意旨”。无论如何，谁也不会怀疑这个“天的意旨”中不仅有天文学，也同时包括宗教在内。如是，亚当·沙尔的天文学成果中自然也播下了上帝的种子。

## 八、锦衣卫里的替罪羊

耶稣会神父们进入中国已有五十多年了，但从无一入有幸见到皇帝的龙颜，亚当·沙尔也不例外。

当时，有几个隶属其它教团的传教士也来到中国。他们毫无经验地严厉谴责那些谨慎处事的耶稣会士，提出要对皇帝和政府实施正面强攻，一举占领中国。

其中，有两个后来的传教士惹起了骚乱，这次骚乱几乎葬送了他们的生命。如果没有影响素著的亚当·沙尔帮助他们死里逃生，他们必死无疑。这两个急性子传教士想效仿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者那样去征服北京，他们的名字是弗朗西斯科·德·拉·马德格·德·的奥斯和嘎斯帕·阿伦达。另有三位充当翻译的中国小伙子送这两位大无畏者向龙椅前进，去威逼那位他们认为徒具虚名的天子。然而，未经允许就进入中国的都城，这本身就是谋逆之罪。亚当·沙尔还是接待了他们，他也因此而成为违法者。两位勇敢者要求皇帝立刻召见，并且威胁道：西班牙定能用武



力征服难于驾驭的中国。

锦衣卫立即闻讯赶到，审问了沙尔的客人，而那几位中国翻译则直截了当地被捆绑入狱。

“你们未经批准进入中国。”皇帝的侍卫们对扰乱者斥责道。

两位被告者用十字架进行反抗：“只有一个上帝，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稣，就是我们手中拿着的圣像。”

锦衣卫官员再次强调：“不允许你们在没有批准的情况下进入中国。”两位神父对此拒不作答，却继续他们的布道：“你们是受人指使的刽子手，你们迷了路，你们不相信神圣的三位一体（即神父、神之子、神灵）以及基督耶稣的人物化、死亡、复活的事实，但你们的宗教却是魔鬼的，它必将你们引到地狱。”

锦衣卫夺过他们的十字架，认为这些狂妄的家伙毫不懂礼仪，并以斩首极刑相威吓。

亚当·沙尔采取了一切措施，为使他们免于过堂受审，因为那将会杀他们的头。他为了拉关系而动用了七十两白银去行贿，他成功了。弗朗西斯科和嘎帕斯被驱逐到某国的船上，丝毫未受损伤。

亚当·沙尔向在澳门的朋友阿列克山大·奥代斯——一位老同学和罗马的见习修士——写了

一封充满讥讽口吻的信，讲述了这两个幼稚的传教士引起的令人不快的冲突。沙尔思想敏锐，很爱揶揄人，这也许是一个缺点，但他常以讽刺作为抵抗方法。他在给奥代斯神父的信中说：

“……当时有两位神父来到京城，他们象是下决心充当殉教者，以此为中国皇帝和百姓们传教。他们身着神父袍，手执十字架开始讲道，但没有一个会说汉语。他们在三个中国青年的陪伴下乘轿而来，我们的副主持派我照顾他们。我在城外接待了他们，很严肃地向他们解释，为什么应该用和平安静的方式办事情，然而收效甚微。他们言语急躁，甚至大发雷霆。

我把他们安置在利玛窦生前买下的旧居内，按照待人应有的态度接待他们，安排住房并送去作礼拜的物品等。

中国有好几千人专靠传递消息赚钱谋生，外国人一旦到达此地，便有探子报告官府，官府立即派人抓住他们。

锦衣卫抓我作替罪羊，我被抓去挨了许多粗言恶语的骂和推打，一整夜不让睡觉。然而，这两位神父根本无意当殉教者，居然毫不抵抗地交出了十字架。我竭尽了在意大利学到的全部外交辞令，试图解救他们，乃至去行贿。我说服了官吏免去堂刑讯，只将他们遣往福建，然后从那里乘船

去菲律宾。两位神父毫无试图带走那三位小伙子的意思，他们无所表示地看着三个中国人被捆走——尽管他们知道这三位中国同伙只有一死，罪名是未经允许便带外国人到京城。无论如何，我成功地解救了神父们，因为官府一旦得知他们散布‘西班牙必能用武力征服中国’的言论，他们必死无疑，将被处以凌迟，连我也不会脱离危险。

尽管我们在住处接待并派侍者去服侍神甫们；他们还是蔑视侍者并批评我们的传教工作，好象只有他们自己负有圣使的使命。我们原谅了这两位神父，只当他们是兄长。”

实际情况表明，耶稣会神父所选择的适应中国文化之路是正确的。这并非出卖信仰，对中国这个拥有古老文化的民族来说，并不需要把西方的种种外部特征和教规全部强加给他们。

几个世纪后，有一位伟大的中国政治家约翰·吴（音译）按照自己的理解谈道：“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宗教，都无所谓旧的或新的，它比旧的还旧，比新的还新。我虽在孔教、佛教和道教的环境中长大，但我对基督教却有一种如归故里的亲切感。”

忠诚是宗教的本旨，但不是教条；应该有神圣的追求，但绝非愚蠢，这就是亚当·沙尔和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的宗旨。

## 九、紫禁城内的女信徒

1639年，朝廷六部的要员一齐来到耶稣会的住处找亚当·沙尔，他们分别是：吏部，掌管各级官员的委任、管理、提拔、贬谪之事；户部、礼部，掌管外交事务和美术、科学、国家考试；兵部，统属军队，包括水师和陆军也兼管驿递；另外还有刑部和工部。他们到耶稣会的教堂去拜访圣像，这消息口耳相传，广为人知。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些关在宫墙内形同终身囚犯、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宫女之中，竟然也萌发了福音。尽管她们无缘目睹牧师，仍有许多地位较高、很文明的宫女都受了洗。

宫女有四个等级，第一等级地位最高，包括十二个女人。这些有尊贵身份和文化的宫女，被允许坐在皇帝跟前说话，其中有三人是信徒，占这类人的25%。她们的名字（西文名）分别是：多娜·阿嘎达，多娜·赫莱娜和多娜·伊莎白拉。其中多娜·阿嘎达最为尊贵，她的品德和聪明深得皇帝青睐。皇帝到寺庙内向神仙磕头上贡，她却可以作为一名基督徒免随此礼，尽管这

样做是很危险的。

多娜·赫莱娜是宫女内最漂亮的，身材秀美，却从不愿以簪珥和华服装饰自己。作为一名信徒，她从不玄奇示骄，甚至不戴项链和脂粉，穿着随便。

第二等级的宫女负责皇帝的御服，包括40名宫女，内有二名教徒，分别是露霞和赛昆达。

第三等级的宫女有30人，她们专司御膳，其中有四名教徒：赛西列娅、克赫内、克里娅和特克朗。一次，赛西列娅在皇帝大寿时端送寿面和面汤，不慎摔了一跤，汤和面撒了一地。在中国迷信者的眼中，不顺利之事就是老天爷降罚，赛西列娅的公开出丑则预示着大不吉利，她的疏忽会招来厄运，将受到皇帝的惩罚。

这位吓呆的宫女顿时手足无措，另一位也是教徒的宫女姊妹悄悄近前耳语，让她向圣母祷告，她立即许愿做了200次祈祷。平时异常严肃的皇帝望着这位惊恐不安的宫女，突然大笑起来，连训斥之类的惩罚都免了。

在一位耶稣会神父的报告中，称宫中的女教徒是“盛开之花”。

1637年，在金碧辉煌却又形同装着监狱栅栏的皇宫里面，共有18名女教徒；1638年，21名；1639年，40名；1642年，50名，甚至连前皇帝的

遗孀也信了教。

在紫禁城内，信教的宫女们布置了一处给圣母作礼拜的小教堂，她们聚在里边一起祷告。当然，她们永远也不可能听牧师布道或接受宗教仪式，因为没有一个人被允许进入宫墙内的那处“教堂”。

没有一个生理完全的男人能够获准生活在宫墙之内，只有找一个众人皆恨的太监朋党中的一位太监，才能充当沙尔神父与封闭在皇宫内的宫女之间的联络人。亚当·沙尔真的在太监中找到了一位帮手，一位紫禁城内的耶稣信徒，名叫王约瑟。王太监以前当过皇帝奶妈的侍从，深通仪礼，而且天性知足，很受众人喜爱。他成为教徒的榜样，代培了宫女信徒并为之受洗。如果宫女向她们心灵上的父亲亚当·沙尔进行忏悔和赎罪，或是亚当·沙尔送给宫女某件使心灵净化的念珠、圣骨、纪念章等物，皆由王约瑟充当传递人。

这些有信仰的宫女在皇帝或皇后身边工作时，无形中创造了一种圣洁的环境和宗教式的幽静气氛，使皇帝对宗教产生好感。皇帝和皇后很佩服这些女教徒的和睦与高尚，她们不允许自己落入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泥淖，以免玷污自己圣洁的灵魂。她们不仅以自身行为去影响皇帝，

甚至几次诚惶诚恐地劝说皇帝信教。

崇祯皇帝是一位很严格和正派的统治者，亚当·沙尔希望有一天能收洗这位世界上最大的君主。这位真龙天子对天主教也的确很亲密，他拆毁宫内的佛像，佛教的和尚们也被冷落一旁。他允许太监们信教，周围的教徒们也受到保护。他的后妃中有一个笃信佛教也同样受到皇帝的宠爱，另有两位对基督教很友好，悉听自便。亚当·沙尔关心的重点并不在宫内人，而是皇帝对宗教的态度。自然，沙尔也很关心京师和全国的情况。

全国的七万名信徒之内，有几百名官吏和知识分子。

沙尔不仅是一位皇家的天文学家，同时也是北京教区的牧师。那时，沙尔和龙华民管理着以北京为中心的城内外16个教会，而且发展势头很猛。沙尔除了自然科学的著作之外，还出版了好几部宗教的书，诸如两册装的《关于上帝的意旨》、八册装的《关于八种幸福》和四册装的《耶稣宗教的本源》等。

他屡次想辞去皇宫的职务，而将自己的精力完全贡献给传教工作。

当时，他在各省传教的同志们，即包括耶稣会的24名神父和3名修道士，而每年收洗入教者

却达5 000多人。这些耶稣会伙伴们经常激烈批评和提醒沙尔，认为他应当留在皇帝身边，而凭借他在皇宫里的声威可以给全国的基督教带来很多益处。

傅泛济副大主持在给罗马教团的信中写得很清楚：“约翰·亚当神父除了传教士的一般工作之外，还和罗雅各神父共同热心地负责修改历法，理应得到特别的尊敬和鼓励……。肯定地说，在我们所采用的各种人道的手段之中，能使教会取得目前地位的途径，就是修改历法。”

又有一次，傅泛济告诉罗马教团的领导人：

“约翰·亚当神父现任北京教区会长，他为上帝和教团所做的工作，通过他的数学作品和关于宗教入门指示的书，也通过使宫女们信教，贡献是很大的。我们能在这个国家有所作为，都是在北京代表我们事业的约翰·亚当神父的努力工作的结果。”



## 十、皇帝忘了吃饭

1640年是崇祯皇帝执政的第十三年，廷臣们在皇帝的宝库中寻找物品时，偶然发现了一件十分奇特的乐器，上边铸有拉丁文写的金色字母：为主唱一支新歌！这是一件尘封很久的古钢琴（现代钢琴的前身），系利玛窦在四十年前送给万历皇帝、即现在统治者的爷爷的礼品。

当有人将此事告知皇帝时，不意引起他想听西方音乐的极大好奇心，下令将古钢琴送至亚当·沙尔处修理。沙尔立即通知一位内符的耶稣会兄弟克利斯朵夫（即徐福元）从河南赶来，他们先做出银质的琴弦，然后一起修理和调音。沙尔自幼喜爱弹钢琴，他使用中文写了一份弹琴的说明书，翻译了十篇圣经的诗篇，并为赞美诗亲自谱曲，为了“通过唱歌和音乐使耶稣的学说进入皇宫”。

他利用送还古钢琴的机会，在1640年9月8日送给天子两件十分珍贵的美术作品。这两件美术作品原来的主人是巴伐利亚的贵族马克西米利亚第一大公，马克西米利亚当时在欧洲的三十年

代战争中担任天主教联盟首领，是他将这两件美术作品赠给了前往中国的传教士。

一位高级官吏立即把艺术品包在嵌有金银的丝巾中，然后亲自呈送到皇帝的寝宫。一般情况下，皇帝观看礼品总是漫不经心的，多是让侍从往礼品库一送了事。然而，对于亚当·沙尔送来的礼物，他却举行了一场接受庆典，让侍者礼仪隆重地收下，又亲自洗手后以君主的仪范郑重揭开盖布，他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美术作品。

一件艺术品是羊皮纸上画的耶稣生活图，画镶在一个盖有银制盒盖的框内，盖上画着四门徒，并有附记：此即拯救者的生活和死亡的主要情况。另外还附有烫金字母的说明，内容即福音书。里斯本教会的一位贵族曾评估此画价值一千库扎托斯（葡萄牙钱），他深为付不出这笔巨款而遗憾。沙尔将经文译成汉文，而且印在画背面。

另一件也是一幅圣像，其大小近似真人，颜色也酷似真人，描绘的是三位国王去拜瞻幼时的耶稣。

多娜·赫莱娜是第一等级宫女中的信徒，她目睹并向沙尔透露了此情景，沙尔才知道皇帝在打开的书画前静坐了很长时间，凝神注视着图画的情景和内容。赫莱娜曾三次催请皇帝吃饭，但

皇帝根本不理睬；看上帝耶稣看得出了神。突然，他叫来皇后，指着马槽里的小孩说：“他永远比我们崇拜的全部圣人、智人和先祖都伟大。”皇后闻言急忙跪下来磕头。

整整十天，皇帝在太和殿内展出这些画像，下令让皇宫内的全部官吏、后妃、宫女和太监们前来恭敬地礼拜这位伟大的天主。后几天中，多娜·赫列娜见到皇帝时常浏览这些书画。一次，皇帝猛然站起，象是百思不得其中奥义，然后又象一只被困笼中的猛兽一样来回走动，不时发出长嘘短叹。这位被皇宫仪礼束缚的俘虏有感于上帝的恩典，在绝望中自言自语道：“谁能够向我说明白呢？”

## 十一、“你们这些没有用的家伙”

那位恨不得对耶稣会神父们食肉寝皮的魏公，这时已衰老去世。然而，这个想毁灭外来者亚当·沙尔等人的大患，只是一个多角怪兽的头。

魏公在太监里的同谋又对沙尔进行诽谤中伤，这些太监在紫禁城管理着耶稣会赠送给皇帝的天文仪器，他们以最卑鄙的方法欺骗皇帝，以使沙尔的威望扫地。他们伪造天文计算的错误数据，向皇帝谎称是耶稣会神父们不准确的仪器和欧洲天文计算方法的恶果。

太监们的阴谋诡计对在天文方面缺乏知识和轻信的皇帝果然奏效，据说沙尔的仪器经常失误，皇帝因此不敢公开推行由教士们改革过的历法，而且和沙尔的亲密关系也日益疏远。他从前因对基督教发生兴趣而撤走的佛像，现在又被请回了皇宫，而耶稣会神父们安装的观测仪器，恰好成为障碍物而拆开运走，另装别处。就在仪器的拆装之间，对耶稣教士心怀不满的太监们安排

了一次对神父的新打击，因为安置错误的仪器必将导致错误的结果。

皇帝想再次给欧洲的计算方法一次验证机会，他下令宫内天文家小心谨慎地检查1641年10月19日的月食预告。这一次太监们用不着撒谎，为了败坏耶稣会天文学家的名声，他们以安置错误的仪器观测天文，结果使送呈皇宫的预报与沙尔的计算数据、即月食实际发生时间相差半小时，皇帝对欧洲天文学的怀疑于是被进一步证实。皇帝贸然决定：既然中国和欧洲的天文学都有弊端，我们仍沿用大统历，而且应将旧的置于新的前边，国内的置于国外的之上。

礼部官员平时对沙尔的印象极佳，他们并未急于公布皇帝的谕旨，以使谕旨暂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耶稣会士们听说皇帝怀疑欧洲历算的准确性，皆对此表示否认，因为他们知道皇宫的天文仪器经常出错。沙尔神父得知这些情况后，立即敦促钦天监负责人彼得李（李天经，也是信徒）博士去向皇帝澄清是非，讲明拆装仪器并弄错的事情真相。但是胆小如鼠的李天经象平日一样又动摇胆怯了，沙尔只能寻求别的途径以使皇帝了解内情。

皇帝很快得知真情，便毫不迟疑地派耶稣会神父重新校正了仪器，并决定通过1641年11月3

日预告的日食，最后一次考察这些仪器和耶稣会士的计算方法。这天，天还未亮，沙尔已经来到皇宫前，许多太监在此恭候已久。他未被允许入内，因为阴霾密布，天不作美。沙尔暗自祷告说，请上帝拨云见日，或是请皇帝改次再行观测验证，但皇帝下令等到十点钟，让他少安勿躁。十点整，皇宫的大门准时洞开，可是天空仍不转晴，沙尔便利用此时进一步调准仪器，同时与皇宫的御前天文家们聊天。当沙尔问及他们最近观测天象时有无发现新星座时，这些人张口结舌，窘迫万状。沙尔利用自己的磁石针临时校正好仪器，发现太监们放置仪器时偏差了4度，这就是他们上次计算月食偏差半小时的症结所在。

猛然间，太阳钻了出来，亚当·沙尔立即准确地放好仪器。沙尔十分愠恼，他虽不敢公开怀疑这些皇家天算家在欺骗，但他厉声斥责上次的错误应归咎于这些人的愚昧无知。这位耶稣会神父勃然恼怒的情况，被一位皇家侍卫看在眼里，他对那些半吊子天算家讽刺道：“你们这些没有用的家伙，你们自吹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可既无知又无能。你们还宣称懂得艺术，实际上一无所知，皇帝怎么会再重用你们这些庸材？怎能容忍你再在宫内混日子？”

这个侍卫在讥刺那些人的同时，却给耶稣会

神父端来茶水。茶叶作为一种饮料，当时在欧洲刚开始被接受。

在一块遮住视线的帷幕之后，皇帝听清了上述一切丢脸的情况，终于弄清了皇家星相家们极度无能的本相。起初时，亚当·沙尔并未察觉到天子隐身幕后，只是感到十分奇怪，为什么每当他慷慨陈词时，太监们立即以各种手式和眼色提醒他降低声调，而当他声音过小时，太监又请他说清楚一些，沙尔终于明白了一切。他离开后，皇帝才走出幕后，严斥了那些无能者，并严禁他们参加原定于11月3日的日食观测。皇帝邀请了朝内其他衙门太监一起到观象台，他用自己的眼睛证实了沙尔的计算与天上的情况全部吻合。于是，他立即发布谕旨，批准耶稣会神父们新修改的历法在全国颁行。

遗憾的是，这个时刻并未真正到来，龙椅就已被推翻，中国发生了动乱。

## 十二、盗贼和反叛者

到处洒下怨怒和鲜血之后，李自成成为中国的灾难。他率领义激而起的军队攻城掠地，烧杀洗劫，这个枭雄当了盗匪的首领，并且占领了河南、山西和陕西，很快汇聚起一支来自各省的三十万人的起义队伍。他的名字使官府和朝廷闻风丧胆，其势力严重危及国家和皇帝宝座的安全。开封府是座古老的帝王城，一度被起义者攻占达半年之久。为了夺回城池，奋不顾身的明军统帅下令掘开黄河之堤，水淹开封。然而，李自成十分灵活地率领骑兵突围而出，其来不及撤走的士兵和群众达一百万人葬身于泛滥的黄水之中。其中，也有城内的天主教传教士胡德黑·德·菲格瑞都。

李自成在北方连连攻占了許多城堡后，一位王侯的情妇教会了他许多外交手段。李起初处处播种恐惧，在这个女人的影响之下，他很注意赢得人民的好感。李在北方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很快就宣布推翻了龙椅上的皇帝，一举攻占了北京。



除了内部的敌人，还有外部的敌人危及国家——长城外的满族、即鞑靼人虎视眈眈，这个游牧的小民族时刻觊觎着大民族。

伟大的努尔哈赤（1559—1626）统一内部分裂的游牧部落为一个君主，使这位前部落的首领摇身变成了皇帝。这位傲慢而又忘乎所以的人拒不向明王朝纳贡，并毫不掩饰地暴露出将欲取而代之的企图。从此以后，满族常以重兵压境，摇动了明王朝这条朽败的风雨飘摇的破船。1629年的那一次，满族骑兵十万人突然兵临京畿，难以理解的是，他们并不去占领这座明军并未设防的空城。

满族人毫无困难地每年走过长城，进行洗劫式的侵扰，被刀剑吓坏了的京畿人民常处于惊惧之中。抢劫活动给满族人带来丰厚的战利品，明王朝好像根本无力抵抗：达官显贵们骄奢淫逸，百姓们则以草根树皮果腹，军队的将帅和朝臣们唯利是图，不顾人民死活，导致内外敌人都想成为龙椅上执政者的掘墓人。

这些现实难道可以回避吗？

### 十三、矿石铸冶大炮

走投无路的皇帝日夜苦思，如何才能抵挡消灭李自成军队的进攻和满族骑兵的弓箭？他忽然想到由亚当·沙尔出来拯救国家。

1634年7月的一天，皇帝派兵部尚书去耶稣会住处，目的是不露声色地摸清亚当·沙尔是否懂得用矿石铸冶大炮的技术，目前只有求助于葡萄牙人所用的先进火炮，用这种战争武器挽救国家，使国家转危为安。

毫无戒备的亚当·沙尔上了皇宫布设的圈套，他兴致勃勃地谈起欧洲武器的技术，关于浇铸技术和各种金属的配合比。

他说：“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我们制造武器需要矿石、铅、铜、锡、木料和粘土，而这些原材料在我们这个国家都不缺少。”

“是的。”兵部尚书说着立即掏出皇帝的圣旨：“天子圣谕，令你用矿石铸冶大炮，挽救国家免于沉沦的重任，就放在你汤若望的肩上。”

“武器制造决不是我的职事。”神父发怒地说：“我毫无实际经验，没有实验过的书本知识

是无济于事的。”

“那与我无关。”兵部尚书作别道：“我只是奉命转达圣旨。”

沙尔为了使皇帝收回成命，特意至皇宫递了奏折，恳请皇帝免于让他负责军火生产。但天子执拗地认为，只有火炮才能使国家摆脱威胁和混乱的境地。

沙尔扪心自问，一位福音的使者能否去制造武器？他无法说服自己，只得去求教子教团的负责人。这位负责人反复权衡利弊，认为作为中国人的一员，尽管他是天主教的神父，也不该被禁止用斗争的手段去抵抗无政府主义者、盗匪和国家的敌人，而这些人恰好是破坏这个传统悠久的礼义之邦的基础。另外，还应保卫尊严的和非常合法称职的皇帝，这就是当时不容批评的正确看法。当然，在当时尚无人能发现其中有不协调之处，但在当时的报告里，没有一句非议或怀疑这种做法的词句。所以，尽管沙尔起初力拒此事，但作为皇帝的臣民，他不得不最终屈从皇帝的意旨。

朝廷下令给耶稣会神父在皇宫内拨出一处宽敞的地方，用来建起制造作坊，另派人送来所需的金属材料 and 助手。然而，派来的助手大多是些心术不正的太监，他们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趁作坊师傅不在时，这些家伙盗走了一千多斤金属

原材料。他们还挖空心思地搞破坏，有一次竟用一枚大铁球堵塞了尚未装配成型的炮筒，沙尔为此动用了许多火药排堵，皇帝被这次排堵的轰然巨响吓了一跳，还以为是大难临头。

许多日日夜夜，沙尔为了教会还不懂浇铸技术的中国人而守候在炉火旁。

首批20门大炮以及40公斤重的铅弹做好以后，被装在驴驮上运至城外20公里远的田野里试放。前来参观试炮的官员躲得很远，恐怕危险的火炮会出现炸膛。火炮试放十分成功，骑兵跑出很远去丈量射程并拣回弹丸。皇帝对这次试验成功深感喜悦，下令为战场之需浇铸500门大炮，而且每门炮的重量不得超过30公斤。按照天子的设想，如果在撤退时，这种重量的火炮可由士兵背走而不至遗弃。

一位太监送来皇帝的这道命令，沙尔一听简直乐不可支。他偷偷嘲笑中国官兵还未临阵就先计划逃跑，再说官兵们也不至如此蠢笨，在溃逃时还去背一个那么重的铁家伙。

太监们打着沙尔的旗号定了五十万斤矿石和四万斤锡，皇帝全部予以批准。沙尔立即识破了太监们假公济私的诡计，因为实际需要量仅此数目的十分之一即可。沙尔不允许在他的名下出现如此大的骗局，当即予以揭露。

同时，皇帝还请沙尔为保卫北京修建的防御工事提建议。沙尔神父做了一个防御工事的木模型，这个木模型上设计了三角射击区域，以便于射箭。

这个木模型受到皇帝的欢迎，下令让沙尔和兵部官员共商如何在城墙上设置防御工事，这些军事专家立即与沙尔的意见一拍即合。

沙尔骑马回城后，防御建筑的模型却被交给一位占卜者，这人惊慌地说：“三角射击区使人想起火攻战术，这是一个恶兆，它将引起京城失火。这个西方天算家是个笨蛋，不然他们该懂得三角形建筑必为火星所剋，它不会解除围城之患，只能带来死亡的下场。”

这些占卜者的意见对于迷信的军事专家仍有相当大的影响，于是负责修筑工事的人问道：

“我们应该修一个什么样的防御堡垒呢？”

“一个四方形的。”

不久，亚当·沙尔去察看防御建筑的进度，他惊慌地看到防御工事全是四方形的。他勒马对陪同者说：“如果我是盗匪的话，我就从这个地方进攻，只须三天定可攻占城市。”

事实证明，李自成的军队后来正是在此处攻破了城墙，仅用三天就占领了北京，而那位四方形工事的发明者，恰恰第一个丧了命。

## 十四、太监们的报复

北京城的陷落主要是因为泄密。李自成在南城的西边城门安排了攻城军队。南城是北京的前卫，城墙上的城垛间架设着沙尔制造的火炮，李自成特别惧怕它。然而，火炮全都变成了哑巴，因为一个姓曹的太监负责南城西门的守卫，他不仅泄了密，而且不加抵抗地于1644年4月23日开城门投降。

皇帝听说曹太监的叛变行为后，立即穿着御服骑马驰往南城，以激励他的军队抵抗，但他没跑多远就被披盔贯甲的官兵拦了回来。

亚当·沙尔目睹皇帝策马驰过耶稣会房前，御服在风中象鸟儿扑打的翅膀一样飞舞。皇帝好象打算从北城的东门逃跑，但接近城门时，城上竟有一些背叛的太监向他开炮，他无力抵挡，只得退回皇宫，所有的内侍都已逃散，他只能将命运托于占卜者摆布。

李自成不发一矢地占领南城后，又转而攻打内城。就在不久前被沙尔指出的那处漏洞的地方，李自成军攻破三个缺口。4月25日，他和三

十万军队开进内城，连破三道宫墙，想立即抓住天子，可皇位上人去椅空。在没有主人的皇宫里，太监们抢劫了皇帝的财宝箱。李自成宣布，谁能抓住皇帝，将赏赐黄金十万两，可无人知晓皇帝的下落。

如前所述，崇祯皇帝在位时曾削夺了太监们的权势，因为这些太监偷盗了不计其数的金锭和大约十五个装满奇珍异宝的宝箱，据为己有。在受到皇帝惩处后，他们就伺机报复，沙尔形容“他们象狗一样疯狂”，他们想毁掉皇帝和明王朝。

敌人日益近逼的事实，给了太监们一个天赐良机，通过宫廷政变从背后攻击皇帝。三千名太监一旦握住为保卫京师而战的七万军队的指挥权，立即反戈倒噬，向农民军投降。

宫内人纷纷作鸟兽散，早已撇下皇帝不管。当一个占卜师开始打卦摇签时，皇帝闭上眼睛，从签桶中抽出一支。如果他选中最长的一支，就该去和李自成战死沙场；如果他选取中间一根，就该在皇宫内迎降；但是，皇帝抽中了最短的一根，按照中国的迷信说法，其意思就是国家气数已尽了。在一片极度的混乱之中，他下令皇后自缢，让十八岁的皇长子换上破衣，混迹于百姓中去逃生。为了使十五岁的女儿免受农民军玷污或

沦为奴婢，他想用刀砍死她，但女儿在躲闪中仅被砍掉一条手臂，然后负痛而逃了。

皇帝自己跑到皇宫后边的煤山，躲进小山上的一所小房子内，用刀刺破左手臂，扯下衣襟，用血写道：“谨祝新君即位，请勿施虐于民，勿用叛逆者。”<sup>①</sup>他先丢掉了代表皇权的玉玺，然后用腰带系在小亭子的椽子上自缢身亡了。

沙尔十分悲伤地说：“这样的皇帝之死是不公平的，他是世界上最大的统治者之一。他性格善良，死时孑然一身，无亲无朋，年仅36岁。他成了一种不明智的统治所引起的恶果的牺牲，长达276年的大明王朝和皇帝，从此不复存在了，这使我感到痛苦和悲伤。在我的拯救之路上，皇帝不幸离我而去，圣教自万历时传入中国，崇祯皇帝不仅从不蔑视它，而且促进其发展，这对他的臣民的贡献是巨大的。”

李自成无法找到皇帝的尸体。

盗匪的队伍象蝗虫一样遮天盖地地遍布北京，他们抢掠皇宫和富户的财宝，杀人放火，连

---

<sup>①</sup> 崇祯帝血书衣带诏之事，多系传闻，本文作者此处描写不知出处。按王誉昌《甲申朝事小纪》三编中〈崇祯宫词〉注，内称“袖中有书一行，云：‘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于天上，不敢终于正寝。’”云云。



过路人也不放过。这些杀掠成性的人进入富户后，拷打逼财，奸淫妇女，强占民房，许多北京人在绝望中自杀了。

当敌人重兵压境时，亚当·沙尔是耶稣会士中唯一留在城里的人，他的朋友付汛济和龙华民早已撤离到了安全之处。尽管人们都催促亚当·沙尔撤走，可是无济于事，一个好牧人是绝不会见到狼就立即放弃畜群的，他决心与北京的信徒们同生死、共命运。地处城西南门（宣武门）的耶稣会房子，是李自成军队进行搜掠的好地方，可是这些军人每次来到门前时都见到一块禁牌，立即吓得不敢入内，“禁止入内，此房已占！”

究竟是谁放置的禁牌，至今仍是一个无人知晓的谜。是亚当·沙尔自己？他完全可能干出这件自寻开心的恶作剧，也可能是李自成的侍卫官员们干的，他们也许对这位会造大炮的人感兴趣而有意加以保护。

沙尔为使信徒们振奋精神，冒着生命危险在地狱似的北京城里到处走访。在邻居的一所房子里，藏着四十四名女信徒，几个青壮年男人携棍棒保卫这座房屋，使她们免受凌辱。有几个淫棍仍然闯了进去，他们搜遍整个房子，唯独漏掉其中一间礼拜圣母玛丽娅的小神室，而吓成一团的女人们就躲在这间小屋里祷告，竟然幸免于难。

淫棍们没找到一个女人，恼怒地砸烂室内的所有物品后走了。沙尔听到这些魔鬼的马蹄声走远，才走进屋内，人们将这件幸免于难的事情告诉了他。

尽管星相家们竭力劝说李自成择吉登基，晓谕全国，但李自成还是推迟了登基之日。当时有传言说，李自成每次想坐在龙椅上，立即感到头晕目眩，摔倒在地，这是沐猴而冠的结果。

然而，李自成推迟登基之日的真正原因在于，他认为刚夺得的政权很不稳固，忠于前明皇帝的将领吴三桂尚拥有实力，此人正在北部抵御着满族人。吴三桂一听到北京失陷的消息，便立即发兵勤王。

一天，耶稣会住处来了三位李自成的官员，命令亚当·沙尔立即到皇宫去。这是他的死刑判决吗？

“镣铐在哪儿？”沙尔冷冷地问道：“我知道，凡被你们邀请的人都得锁枷而行。”

进入皇宫，沙尔立即受到心怀敌意的太监们以嘲笑方式的欢迎，这些人是李自成人城后的首批投降者：“欢迎你，代表上帝的先生！”太监们毫不怀疑，新的统治者会把沙尔当成祭坛上的牺牲。沙尔被领着走过审讯之处，里边传出阵阵哀叫，不少以前身为仆人者以毒刑将前明官员虐

待至死。

沙尔起初有些惊慌，但很快镇定地站在了刑具和暴君对面。那位暴君正饮酒赏乐，观看窈窕舞女跳舞助兴。

“你就是汤若望？大炮的制造者？”严厉的目光从对面直射过来，而汤若望也毫不退缩地直视对方。

“我是上帝的人，我的生命在上帝，而不是在你的手中。”

“我敬重勇敢的男人。”专制者点点头，下令给客人倒茶：“我请你今晚在此坐客。”

沙尔神父断然拒绝道：“请允许我天黑以前回家。”

李自成同意了。他的用意很清楚，以后还要利用这位神父的数学和机械学方面的知识。

沙尔离开了断头台，而且是平安无事地走出皇宫，这使那些反复无常的太监们气急败坏。他们咬牙切齿，用中国人的习惯讲法，叫作怒火中烧。

李自成还无法成为国家的主人，因为吴三桂将军在皇帝死后，便很快与过去一直频频交战的满族结为联盟。起义军首领李自成在北京留下一支劲旅守城，然后率领二十万大军，怀着必胜的信心北征。然而，他此行却一败涂地。

他很快退守北京，正式登上龙椅，让人们奉他为中国的皇帝。虽然，他的精兵、武器、火炮和食粮都不缺乏，还是无法在北京站稳脚跟。当天，他就调集主要兵力逃往山西省，同时下令留守北京的三千骑兵把皇宫和都城夷为废墟，并将皇宫内难以数计的财宝统统装车劫走。

城内的房宅多被火药炸毁，北京城变成一片火海，毁坏皇宫建筑的巨响一直传到沙尔的住处。

沙尔的住房和教堂完好无损，这使盗匪们感到气忿。他们从城墙上向沙尔的住处抛掷燃烧物，但枉费心机。他们又从路上张弓发射火箭，也无济于事。后来，他们在大门口处堆放干树枝，企图放火烧毁房子，恰逢一阵风将树枝卷出五十多步远，纵火者也失败了。

虽然火星象雨点一样从着火的城门口处喷过来，溅得耶稣会房前院内到处都是火星。院内的花园起了火，树木都烧得好似严冬里的枯木，而耶稣会的房舍却始终未被燃着，真乃世界上的又一大奇迹。

许多受伤者纷纷逃避到耶稣会这所没着火的屋子里，其中一人脖上中箭，另一人臂上中弹，沙尔替他们一一敷药包扎。有一次，盗匪们在院墙上打了一个洞，想钻墙进来偷东西，沙尔喊

道：“呀！钻墙是贼的行为，你们这些军人难道也是小偷吗？”这些人闻言就逃走了。

亚当·沙尔在附近未着火的房子中寻找和鼓舞着幸存者，许多人都因国破家散而自杀了，也有些人在绝望的最后时刻，因沙尔的出现而得救了。有一队农民军用火炮炸坏了耶稣会住房的大门冲进院内，又用钎凿和斧子打开内门，一些人挥舞着矛枪和棍子爬上房顶。这时，亚当·沙尔血管里勇于斗争的贵族骑士的血液沸腾了，他手执一把日本塔木拉刀，站在进犯者的必经之路上，凶神恶煞地掀起他的大胡子——这部大胡子就足以吓退敌人。他幽默地说：“我的胡子就足够用了。”他那狂怒而犀利的目光无人能抵挡。他立于道上，手执利器的来犯者立即威风扫地，都变成了懦夫，一个个喏喏而退。

李自成的三千骑兵在北京大抢出手，每人约从皇宫中拿到五百两金银和财宝，然后把物品捆在马背上，飞快地撤退了。但这三千名骑兵最后只能带走抢夺财宝的四分之一，因为马匹负担过重，不得不遗弃许多物品。在出北京城向南的十天路程之内，人们可以拣到皇宫的丝绸、华贵的服装、地毯、宝石、各种器皿和家俱。

起义军最后被满族和吴三桂联军歼灭，李自成本人在逃跑途中也被农民打死了。

沙尔在耶稣会的住所内有三间房屋，一间是空的，另两间内存放着他的三千本图书和数学、天文学仪器，还有印版等物。空房间被火烧了，而另两间存放档案图书和仪器的房间却幸存下来。

对亚当·沙尔来说，这乃是天的示意。因为他在一个月的改朝换代期间，曾下决心和天文学、历法学告别，从而完全将精力转到牧师的工作上。但是，全部天文材料无法解释地幸存下来，这似乎向亚当·沙尔预示着：只能继续他为传教事业服务的科学研究。

## 十五、他万岁！万万岁！

农民起义者土崩瓦解之后，满族人集合起他们的军队，踏进了被火烧成废墟的京城之门。狡猾的满族摄政王（多尔衮）代替刚六岁的满族皇帝福临执掌兵权，在汉人（指吴三桂）的请求之下来到北京，入城式是在1644年6月7日举行的。摄政王首先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在景山找到了明朝皇帝的尸体，十分尊敬地予以厚敛。下葬地点是一座非常漂亮的陵墓，座落于松柏树之间。几个月后，新的统治者（福临）象过节一样通过正南的中门被送到北京，1644年10月30日建国号顺治（即顺承天意）。他坐上了虚位以待的龙椅，北京的人群中又响起新的欢呼声：“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不久，中国人就从美梦中惊醒，被征服地区的男人作为顺民，必须按照鞑靼人的发式剃头，即仅在脑后留一根辫子，余发全部剃除。很多汉人坚决反抗鞑靼人的薙发和易服命令，有许多人宁可因此丢了脑袋。

北京城里的人们接到命令，凡居住在条件优

越的北城（指内城）内的汉人必须在三天之内迁走，搬到有沟池隔开的穷地方（南城），北城将留给满族人。从此，北城就叫鞑靼城，南城也叫汉人城。

皇宫前跪着很多请求留居北城的人，亚当·沙尔也穿着和普通汉人一样的衣服，挤在这些人的行列之间，趾高气昂的差役们用皮鞭和棍棒驱赶这些形同囚犯的人们。有一位清朝的重要官员姓范（范文程），他注意到这张陌生的满脸长须的外国人脸庞，招手示意沙尔过来。他深表同情地听沙尔说：“我是神父，在北城有一个书库，还有很多印版和历法的著作，另有一处教堂。”

“什么教堂？是一座庙？”

“就是作礼拜的房子。”

“为什么不贡奉牺牲？”

“因为强调我们的宗教是无与伦比的。”

沙尔请求道：“我不可能在三天之内把我的书画和印版等物搬到南城，因为前皇帝委托我修改历法，我为此积累的许多东西如短期搬运，必然受到破坏。我请求能允许留居原处，以便从事我的职业。”

“请你站起来。”这位大官简短地结束了这次会见：“明天你将得到答复。”

两个文职官员送沙尔返家，并按上司的命令



查证了沙尔的住处，他们对沙尔工作成绩的鉴定，显然是有利于沙尔的。所以第二天一早，沙尔来到皇宫，受到热情的接待，并接到一件谕旨：严禁任何鞑鞑人动汤若望的房子和东西。

沙尔回到耶稣会住处，不啻捧回了一张权力无限的符咒。当进入教堂的满族军队要赶他出去时，他立即出示谕旨，这些不速之客只能怏怏而退。沙尔把告谕贴在大门上，立即收到许多方面的照顾。若不是他那大无畏的男子汉气概，李自成那些凶狠的骑兵会象飓风一样，将天主教扫荡干净；当国家象一艘失控的船又被更强有力者重新控制时，沙尔已站立在这条船上，他以勇敢面对残暴，赢得了满族人的敬佩。

当新王朝统治后的第一次日食出现时，就决定了沙尔以后的命运。象以往的多次比赛一样，中国、阿拉伯和欧洲的天算学者都接到指令，他们将以各自的计算方法预报日食，而且公诸于众。最公正的裁判是太阳自己，日食出现时，在场者都必须伏地叩头。按照鞑鞑人的传统观念，这是以祷告帮助太阳度过艰难时刻。

冯某和李某代表皇帝在沙尔陪同下亲临观象台观察日食，冯对沙尔的精确实算深表赞赏，怀着崇敬的心情高度称誉为“尽善尽美”，这是古代智者孟子的名言，也是中国的最高荣誉。

被深深吸引住的大臣们取来纸笔，挥豪写道：“我们内院大臣参加了这次日食观测，看到了大统历与食亏情况相差一半，回回历算法在时间上差一小时，唯有欧洲人介绍的西法，在黄道和时间上都准确无误。对于在前朝由嫉妒而受到压抑的汤若望的有成效的工作，则应归功于本朝。”

沙尔的计算与日食情况完全吻合，在参加观测的官员们的赞誉声中，朝廷决定废除中国传统的纪时历，派汤若望出任钦天监监正。此时，正是尚未及亲政年纪的皇帝的代理者多尔衮——又称“阿玛王”（即大旗主、父亲的意思）在朝中柄政。

前明时期，沙尔并没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职位，却担负着十分繁重的天文台工作。钦天监的负责人先是波尔徐（徐光启），后来是彼得李（李天经），但作为一名教会的神父，沙尔并不计较，更从不辩白自己为何无缘得到天文台领导的称号、名誉和官职，还有五品官的官服和印绶。他八次上书清朝皇帝，要求不要对他加官进爵，表示当一名神父的职责就是每日晨昏祈祷，还有每天法定的八次祷告日课，由于这些工作缠身，他无法再胜任钦天监工作。但在规定的朝拜和工作日，他仍然和许多官员进宫，还得每天过

问天文台的事情并住在钦天监内。

皇帝起初对此十分生气，对这位有悖谕旨的耶稣会神父有意冷落，但终于原谅了他，提出免去沙尔的杂务和天文职事。

教团的领导傅泛济神父听到此事，被沙尔那种断然否定圣谕的态度吓坏了，这将意味着敌视当朝统治者。他说服了沙尔，使其顺从圣意，接受皇宫的委派。

亚当·沙尔勉强答应仍继续天文工作的另外原因，是因为皇帝同意他免去每日上朝以及其它繁文缛节，并且同意他担任钦天监之职而住在耶稣会住处。

皇帝发布谕旨亲点沙尔为国家最高级天文家和历算家，其谕旨说（大意）：“（1644年）朕即位大统，建国改元之初，择吉日定历法为要务。时逢秋八月之日食，朕令要员查看天象，食亏前后与沙尔计算相合，准确无误。第二次查看月食，于翌年春二月，亦计算无误，此乃天生沙尔授命其修改历法也。据此，朕任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纂修新历，为全国制定历法。汤若望忠于信仰，无妻室，无官职，唯朕令其出任钦天监之职方才应允。”

新任命的钦天监监正成了天子的座上宾，每日两次由宫中送去御膳。在每月初一的日子里，

户部都派人送来钱粮、米、茶和盐，另外定时发放衣服、布、被褥、朝靴、帽和马匹。沙尔即任之前，钦天监内的惯例是下级官吏必须从薪俸中支出一部分向顶头上司纳贿，这种陈规陋习立即被上任的沙尔禁绝。他不但严禁下属们送礼，而且上疏为提高小官吏们的薪俸而呼吁。他象慈父一样关心这些可怜的穷官吏，冬天为他们安排羊皮大衣、棉服和煤，使他们免受冻馁。另外，作为新的钦天监负责人，他将以实际行动表明：决不为迷信开门，他与那些占卦卜筮的术士们毫无共同之处，而是全心全意从事历法科学的计算。总之，他不是卜筮者，而是一位上帝的人和科学家。

无论作为天文学家还是牧师，沙尔都时刻不忘上帝的使命。1650年，也就是清朝开国的第七个年头时，沙尔已成为一个很有权力的大官儿。他决心在北京一个热闹的地点建一座大教堂，因为原来的小教堂从外观上几乎认不出教堂的模样。礼部根本不同意盖新教堂，但沙尔觉得无须征得礼部同意，仅凭借自己的权威就行。他自己画了一张草图并制定了施工计划，一年之内，城里长出了一座在远处一望而知的20米高的巴罗克式教堂。教堂上边有一座圆顶，内有三间大厅，五座圣坛。这些大厅和圣坛引起北京群众的真诚

崇敬和由衷的敬仰，他们纷纷好奇地前来观看，沙尔的同志及接班人南怀仁这样评价教堂的建筑：“连罗马都会为这样一座教堂建筑而骄傲，这是伟大的建筑艺术之一。”

在正面醒目的大门上，沙尔安置了一块大理石牌子，上边写道：

“至万历时西士利玛窦等，先后接踵入中国传教，译有经典，著有书籍，传衍至今。荷蒙清朝特用西法，定造时宪新历，颁行历务，告竣。谨于都城宣武门内虔建天主新堂，昭明正教。时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五十年，为大清顺治七年岁次庚寅。

修政历法汤若望记。”

## 十六、两位耶稣会神父：背信 弃义的战俘和奴隶

一天，有两名耶稣会神父被作为战俘押送到北京。他们的名字是路德维克·伯格里沃（利类思）神父和嘎布也·马格拉斯（安文斯）神父。他们此时还能活在人世间，完全仰仗沙尔的威望，但他们却恩将仇报。

他们自己也不知干了些什么事，历史学家埃封·魏特先生宽宏大量地写道：“我们不要再向马格拉斯和伯格里沃的身上扔石头，他们在两年之内一直生活在随时被杀头的极度危险之中，所以他们的神经几乎错乱了。”

这是怎么回事？

中国西部有一个叫张献忠的土匪首领，他坚持反抗满族人的统治。张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穷奢极欲者，他玷污了中国历史”（英国汉学家翟理斯语），他自封为皇帝，尤其嗜好将人慢慢折磨至死。这个暴君在占领四川的成都后，竟杀人达六十万，河水被血染成了红色。一次，他自己的军队在战争中失败，他竟下令以碎尸之刑处死

了十四万士兵。

当时，伯格里沃和马格拉斯神父正在成都传教，他们不慌不忙地逃到一个当官的朋友家藏了起来，但这人告发了他们。张献忠四出搜捕这些博学的欧洲人，终于抓到了两位神父。觊觎帝位的张献忠打算按照北京皇宫的样子，替自己也布置一处皇宫，并且在皇宫内也设置天文家。他发给这两个欧洲人官服，称他们为“天算国师”，每月俸银十两。这样，伯格里沃和马格拉斯神父就身不由己地当了这个暴君的官。在张以死亡威胁之下，神父们只能完全听从摆布，制做了地球仪和浑天仪等天文学仪器。张献忠攻占山西后，下令杀掉妨碍行军的300名侍女，并下令所有的军人也杀掉自己的妻室，给四十万军人的妻女下了死刑判决书。

马格拉斯和伯格里沃神父曾恳求这位暴君免去他们的职务，但张献忠恫吓要揭掉他们的头皮。后来，张还有两次要杀神父未遂，因为神父诅咒他将受到上帝的惩罚。

一次战斗中，有五名飞驰而来的满族骑兵，迅雷不及掩耳地靠近张的阵地。他们挽弓发箭，射死了张献忠。然而，耶稣会神父们的痛苦道路并未结束。

一名满族骑兵揪住马格拉斯神父的头发，把

刀横在他的脖子上。

“住手！”一位军官喊道。他一见这位挨刀者是大胡子，就想起了亚当·沙尔，而沙尔此时正在北京享受着最高等级历算家的优厚待遇。这个军官问道：“你认识汤若望吗？”

“他是我的兄弟。”吓坏了的耶稣会神父惊魂未定地答道。由于汤若望的声誉，这个军官留下了两位神父的性命。但因为他们作过张献忠的官，仍作为战俘被带去见统帅。统帅也对沙尔怀有好感，未加害两位神父。

马格拉斯得救后，很感动地给亚当·沙尔写了一封信，感叹道：“啊！应该祝福的历法，有了你，我们才有了生命！”

按照大清律，这两名当过张献忠的官的耶稣会神父应划为战犯，而战犯和杀害父母则是鞑靼人惩治犯罪法律中最严厉的罪行。但马格拉斯和伯格里沃作为战犯被押送北京的途中，清军碍于沙尔的声誉，对两位神父给予人道的待遇。

在北京，一条谣言象野火一样四处蔓延：说这两名耶稣会神父不仅是农民反叛队伍的领导成员，而且参与了残忍的杀戮暴行。虽然，刑部官员并未以这些缺乏证据的传言去量刑，终因他们担任过反叛者的大官而必须判死刑。刑部官员们睁一眼、闭一眼地审理了两位神父的叛逆谋反



罪，然后送他们到礼部的一处房舍中软禁了起来。刑部官员不敢释放他们，恐怕引起武将们的不满。

清政府曾几次想将这两位贵宾一样的战俘偷偷送往澳门，但神父们放弃了这些秘密离境的机会，那么他们只能依律被遣发给一位满族高级军官当奴隶，好在这个满族军官对他们十分客气。

沙尔为了营救这两个同志而煞费苦心，他无法与被囚者见面，更不能公开去活动，那将会给自己带来危险。经过沙尔的多方暗中斡旋，这两名沦为奴隶的神父终于获释，而且被允许自由传教。

然而，两位神父的神经可能由于过度紧张而出了毛病，他们反而指责亚当·沙尔在背后落井下石。他们怀疑沙尔阻止他们搬到耶稣会居住，说沙尔当了皇帝的官儿，必有不可告人的隐私。他们害怕有人对他们并非完全是苦行僧的生活吹毛求疵，所以，他们整日胡思乱想。

善于舞文弄墨的马格拉斯到处写信说沙尔的坏话，几个教徒中的害群之马，也随声附和着马格拉斯的诬陷。他们完全无视沙尔做官是极不情愿的，而是其上司命令他这样干的。沙尔既然身居官位，自然免不得许多社会和官场上的应酬，根本无法去过那种向往的隐居、僧侣般的清苦生活。

沙尔不知道如何对付诬陷，只相信上帝的意旨。耶稣会教团派出威望很高的潘国光神父，让他仔细澄清此事。

潘国光神父经过周密调查，写了一份正式的报告：

“调查人，弗朗西斯科·彭卡都（即潘国光）修道士。我已对北京教会内的情况了如指掌，弄清了报复者的谎言和诬告全是捏造，伤害了沙尔神父的声望和荣誉。他们用自己那无法管束的舌头，使耶稣会的同志们莠莠不分，因为他们无法实现曾经企图借助亚当去实现的目的。我可以证实这些诬告纯系恶意捏造，伯格里沃和马格拉斯也承认一直未发现约翰·亚当神父的生活中有失礼或过错，他们也是听信了谗言，因此我确证他们纯系诬告。为了维护约翰·亚当神父的名望，我特写此报告。（亲笔签名及印章）”

显然，诬告完全是凭空捏造。

正直公允的沙尔完全原谅了他们的错误，爱记仇或寻报复对这位豁达诚实的德国人来说是不存在的。这两个背信弃义的战犯和奴隶获释后，被允许在京城<sup>■</sup>的东部建立一处传教士联络站，这样西边旧有的耶稣会和东边新建的耶稣会相得益彰，合作密切，沙尔担任两个耶稣会的负责人。

## 十七、皇帝的朋友

多尔衮（阿玛王）以那个娃娃皇帝的名义号令全中国，他狂妄地自诩为“皇帝和国家的父亲”。1650年年底，他在打猎时猝然死去。

当时，顺治皇帝年仅十三岁，他不希望再有人以他的名义摄政，不愿再当一个傀儡皇帝。从1651年2月1日起，他将权力的缰绳握在了自己手中。

他的早熟程度不仅远远超过其实际年龄，而且超过了同龄的孩子们。他很聪明、正直和善良，但秉性多愁善感。这个草原儿子的天性酷爱狩猎，在皇家那野物丰富的猎场上，他能自如地挽弓射中飞奔的兔子，狩猎时他几乎忘掉一切。

做为一个权力无限的、世界上最大国家的统治者，他只能靠自己，别人无法帮助他，但他很想找一个无私的顾问和朋友。皇帝手下不乏阿谀奉承之徒，多是借取媚皇帝邀功取利，到哪儿去找一位勇敢无私、不计名利的人呢？只有钦天监监正汤若望。他讨厌行贿，性格坚强，团结友善，不计较个人名利并且富于牺牲精神，这是大

家公认的。

皇帝认为沙尔就象一位老爷爷，特准这位顾问和朋友免除一大套宫中的繁琐礼节。沙尔的奏折可直接呈递给皇帝，而且天子无论在寝宫、花园、打猎或在母亲宫中，他都可以直接人见皇帝，甚至无须太监们传唤和面圣时的三跪九叩大礼。

皇帝在隆重的庆典时端坐正中龙椅，沙尔可以坐在皇帝身边带有软垫的椅子上，而其它官员则跪在远离皇帝的丹墀之下。

五十年代，有一个荷兰使团在受到皇帝召见时，惊奇地见到这位竟能安坐在朝廷要员行列中的大官，“一位来自科隆的耶稣会神父，长着银白色的长须，剃着满族发式，身着鞑靼人的衣服，受到中国皇帝的格外敬重。”

皇帝在聘请沙尔为高级私人顾问之前，先派人秘密地对他进行了可靠性考察。密探们昼夜监视其活动情况，不停地暗中跟踪神父，甚至在深更半夜也胡乱找个借口闯入耶稣会住处。多情的天子不太相信神父竟能长期甘守寂寞，怀疑他也许会暗中寻花问柳。然而，密探们的情报却使皇帝大为惊讶：每日直到深夜，沙尔的侍从早鼾声如雷，而他唯一之事就是祷告，看书和写作。他完全是一个自身清白，修持自谨而从无生活劣迹

的人。

当皇帝确信沙尔的诚实品行有如真金、而非塔米尔铜梓合金时，才向神父敞开了自己的心扉，选定他为知心朋友。皇帝称神父为“玛法”，即尊敬的爷爷，这种称谓里包涵着晚辈对长辈和弟子对老师的敬仰之情。

一般情况下，中国皇帝没有出访下级官吏的习惯，但对沙尔却属例外，顺治皇帝经常去看望亚当·沙尔神父。一位编年史学家曾作过统计，皇帝在两年之内曾二十四次访问亚当·沙尔。由于皇帝经常不预告来访时间，所以沙尔无须为迎接皇帝在大门口铺放地毯，或者在住房内特备一把椅子，连饭菜也不用随时预备。皇帝有时突然来访恰逢沙尔不在家，他就暂返蹕回宫并留人传话：我过一会儿再来。皇帝有时带一些贵族同来，也有时带来六百名骑兵护驾。

皇帝在沙尔的房间内显得十分随便，时而在书案前的一张象学生坐的椅子或长条凳上就坐，更喜爱在沙尔的床上盘腿而坐。按中国当时的规定，凡是皇帝坐过的地方必须覆以金黄色布以示尊贵，别人只能向那里磕头，以后再无人敢在该处坐卧。

沙尔得知这一规定后，便诙谐地问皇帝：“陛下，您坐过了这里所有可坐的地方，那么以后我

该坐在哪儿呢？”

皇帝有些吃惊：“玛法，说真的，对于象你这样学识渊博的人来说，再搞这些做法是不合适的。你觉得哪儿舒服就坐在哪儿吧。”

皇帝经常一连数小时地在耶稣会屋内流连忘返，他参观了教堂和住房，连最后的一间密室也不放过，其足迹遍及每一角落。他参观了很有学识的神父们给观象台制作的仪器，又在院内的树荫下休憩，在传教士们栽种的果树上顺手摘取水果吃。

“拿葡萄酒来，玛法”，皇帝在沙尔那儿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我们如此辛苦地长谈了半天，我又渴又累。”

沙尔送上山西省耶稣会士们酿制的红葡萄酒，皇帝只呷了一口便将酒转赐给了同来的五位大臣。沙尔又捧出最好的醇香葡萄酒，这是荷兰使团从欧洲来时送给他的。皇帝开始很满意，但沙尔告知此酒来自遥远的西方时，他竟然象喝了醋一样把酒喷了出来。

皇帝指名要沙尔自己酿制的葡萄酒，沙尔虽对拿出这些太普通的酒有些担心，却也不敢违背命令，好在皇帝很喜欢这种酒，举杯一饮而尽，说：“等秋天葡萄熟了，我还要来品尝葡萄酒。”果然，十月时皇帝如约前来，并且称赞酒

味醇美。

皇帝过生日时（3月15日），中国社会的上层人物、皇室成员、政府显贵等都得至宫中祝寿。一次，皇帝在大寿时无视各界达官显贵都在场，突然走到沙尔跟前宣布：“玛法，我想把过生日的地方改在你的住处，而不是在皇宫内。”

沙尔大吃一惊，赶忙昏头涨脑地跑回家。为了临时安排好这次盛会，他准备了一张皇帝用的桌子，又在屋外的道路上放置了十二张桌子。

皇帝礼遇欧洲朋友的消息，通过邸报传遍全国。

另一次，为了让这位神父老师高兴，皇帝居然在耶稣会房前的宽敞道路上，安排了一场有十八只大象参加的比赛。

沙尔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皇宫，皇帝无论在郊区的行宫，在有鹿和山羊等猎物众多的围场，还是在皇宫里召见或赐宴，沙尔都被允许坐在铺有貂皮的褥子上。当然，沙尔也不能毫不客气地平伸两腿而坐，欧洲人也必须象中国人一样盘膝而坐。当两腿发麻的沙尔想站起来时，皇帝便亲自上前扶持，还按照习惯给沙尔斟上最高级的奶茶，这是对最尊贵的客人才有的礼遇。

有一次，皇帝发现沙尔食欲不振，便问其缘故。玛法告诉他，今天是教徒的“斋戒日”，不

允许吃肉。皇帝闻言便下令从太后处取来鱼和奶制品。

又一次，皇帝在赐宴后赠给沙尔两柄扇子，上有御笔书画和玺章。沙尔对此十分感激，并让一位朝廷要员观看礼品，那人惊叹道：“这礼品价值足抵两千两银。”

皇帝十分惦记沙尔的安全，晚上不让这个近六十岁的老人骑马回家，而派一些皇室亲王护送，以防不虞。好学的皇帝象学生一样拜沙尔为师，学习天文知识。他们常谈论日月食的原因，关于排列和名称，还有行星与流星。

他们讨论中最热门的话题是统治术和社会救济。

“为什么有些道貌岸然的官吏不能恪尽臣职、无法使人信任呢？”皇帝问道。

沙尔直言不讳地说：“我认为上行下效，你应该是大臣们的榜样。”

皇帝闻言颇为不悦，拂袖而去。是沙尔语言尖刻还是皇帝内心有愧，显然是皇帝有愧，没过多久，皇帝又回来了，不仅怒气全消而且深自后悔，亲自给老师沙尔送上奶茶。他常后悔由于过份沉缅于狩猎，从而对国家放松了治理。

沙尔当然懂得，皇帝是一位权力无限的人，只要他稍加暗示，杀人是件轻而易举之事。



皇帝听取了沙尔的批评，并请玛法经常开诚布公地指出自己施政中的弱点。沙尔眼含热泪地劝谏道：“不要成为一位对百姓们喜怒无常的继父，而应是一位慈善良好的父亲；不要把处理国家大事的责任向下推诿，而应对官吏们制定一个标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就职责来讲，一位教皇子读书的太傅，应同时兼任皇帝的监督者，随时提醒皇帝秉公办事。可是皇帝根本不理睬那些太傅，甚至斥责他们：“我有了一位真正的批评者，你们这些人只知贪图名利，应该解除太傅之职，只有汤若望是清白的。”

沙尔最担风险却又干得十分出色的一件事，就是处理叛军首领郑成功进攻南京之事。当时，接到报警的皇帝惊恐万状，企图立即跑回关外的老家去。

皇太后十分严厉地斥责道：“这天下是你的父祖辈苦战流血得来的，难道因你的胆怯而毁于一旦吗？你简直是个坐在龙椅上的胆小鬼！”

顺治皇帝被母亲的“胆小鬼”斥责所激怒，他那草原儿子的好勇斗狠的血沸腾了。他狂怒地拔剑劈碎御椅，嚷道：“我要亲征，不是胜利就是战死，谁敢抗命不遵，我要杀死他！”

皇帝的母亲和奶妈又去说项，但皇帝拔剑相

威胁，她们也只能退下。

第二天，北京的人民都在城门上看到布告，宣布皇帝将要御驾亲征。

在宗室亲王、大臣和许多人的眼中，皇帝简直疯了。如果暴怒的皇帝战死沙场，国家会陷入一场新的混乱，于是全北京城都因此而恐慌起来。

此刻，朝臣们都寄希望于汤若望，只有他才可能说服皇帝。于是，达官显贵们不约而同地列队来到耶稣会邸舍，恳请汤若望出面干涉。沙尔踌躇良久，边祷告边定下决心：“为了大家的利益和基督教的宗旨而万死不辞！”

沙尔求见皇帝，跪劝道：“你不能以性命赌博，而置国家的危险于不顾。我认为，你这种冒险是无济于事的，我甘冒杀身之祸来劝谏，只想表明忠诚。”

皇帝感动了：“你对我太好了，玛法，非常感谢。”

皇宫再度颁诏，称皇帝取消了亲征的计划，廷臣们纷纷涌到耶稣会，称赞沙尔是国家的救星，并以恭敬的态度向他磕头。

沙尔向皇帝推荐，应选派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去和郑成功作战，这样才能取胜。不久，郑成功溃退了。

为了防止军心动摇，满族军队立有严格规定，如果军队最高长官战死，所有参战的将校也都将被处死，因为他们没能尽职去挽救主帅的性命。

在对南明的战争中，有一个性急的地方官在后援未到的情况下，便贸然发起攻击。尽管他本人很勇敢，终因寡不敌众而战死。后续部队虽然取得胜利，却无法救活战死者的性命。按照规定，这些部队的将帅也被戴上镣铐送审，治罪者达200人。

无人敢去为这些本来无罪却成为囚犯的人说情，只有沙尔神父出面规劝皇帝：“陛下，这些军官是无罪的，是死者本人操之过急地发起进攻，我请求您赦免这些死罪的人。”

皇帝深叹了一口气：“只有你说出我的心里想法，玛法，我本想宽恕他们，但唯恐朝臣会产生非议，说年青软弱的皇帝放松了军纪。”

由于沙尔的说情，皇帝下令赦免了200名官兵。

在婚姻之事上不由自主的皇帝，经常被自己丰富的感情和冲动的性格所苦恼。他十三岁时，就和一位蒙古王公的女儿博尔济吉特氏结了婚，但这并不妨碍他和别的女人之间的床第之事。

沙尔得知这一情况后，当面严厉地批评皇

帝，惹得龙颜大怒，转身返回后宫。但沙尔要走时，却又被皇帝请了回来，二人和好如初。沙尔告戒他爱情和道德的道理，皇帝表示：“朕当改前非。”

满族人的本教是萨满教，这是对一种令人神魂颠倒的巫术的崇拜，而在实际上，萨满教和邻近的蒙古喇嘛教几乎融合了。皇太后是一位蒙古人，她特别崇拜喇嘛教，所以这些蒙古喇嘛有恃无恐，利用呼魔唤鬼和巫医之术去影响人们。大喇嘛称“王”，由其僧徒们背着在北京走街串巷。喇嘛们想尽各种方法要挟皇帝，宣称如果不给喇嘛们的利益以保障和满足，皇帝将有大难临头。

沙尔首先挫败了喇嘛教的影响，因为皇帝更倾向于他所崇尚的基督耶稣。

皇帝特别愿意与沙尔讨论宗教问题。一次，皇帝嘱咐书记官把养生术、上帝的信条、恩典和“十戒”等逐一记下来，沙尔说不必如此麻烦，他和别的神父早就著有许多关于耶稣宗教学说的著作。皇帝不管此时外边正刮大风，下令立即取来这些书籍，独自坐在一处僻静的书室内，整整读了一夜。一天，皇帝在皇家图书馆里发现了耶稣生活的画，就是巴伐利亚的马克含亚大主持派人作为前来中国传教教师们编绘的那一张，沙尔把

这件画送给了前朝皇帝。

基督耶稣的情况使顺治皇帝备受感动，他跪了下来，并让沙尔也跪在身边，介绍耶稣的十字架之路。

“我经常向中国的儒生们介绍耶稣的磨难，”沙尔坦率地说：“但这些人天性傲慢，认为耶稣替世人受苦的做法是愚蠢和毫无道理的。他们漫不经心地听我介绍情况，时常插科打诨地取笑我。然而，伟大的陛下却能恭顺地跪下来，十分感动地听我讲述。”

在沙尔神父的住处，皇帝让他介绍跪凳和念珠的用法，而且询问了基督教规以及生活方式。在教堂内，皇帝被一幅耶稣圣迹图所吸引，沙尔建议皇帝返宫后派人临摹此画，但派来的四位宫廷画家各施所长，无一能逼真地复制出这张画。

“陛下，您留下这张画的真迹吧。”沙尔以画相赠。皇帝却没敢受纳，说：“我无缘得到此画。”

圣诞节时，皇帝也饶有兴趣地来到教堂看马槽（耶稣诞生之处），并且观看了耶稣、玛丽娅、天使三位神王和牧民的像。

在“三圣王”的节日，皇帝再至教会，但三圣王的像未摆出来。皇帝问道：“卡斯帕、梅梭、白拉撒在哪儿？”

沙尔答道：“如果世界上最大的王前来礼拜人化的上帝，那么三圣王无须再露面。”

对于沙尔的所作所为，喇嘛们当然不在睡大觉。他们从遥远的西藏拉萨、这个被称为“雪国”的地方请来神王达赖喇嘛，请他到北京以神奇的法术感召人民信教，以使喇嘛教在中原打开市场。活佛此行的重要目的，就是让皇帝不要冷落在中原尚未扎根的喇嘛教，因为皇帝在沙尔的影响下，对喇嘛们日渐冷淡。喇嘛们迫于皇宫的命令，甚至不得不停建一座很大的喇嘛庙。

喇嘛们宣称，喇嘛教的首领乃是人们永远的父亲。藏王将要到来的访问，只有一个目的，为帝王和皇族祝福，利用神奇的巫语为国家禳灾弥祸，保佑幸福。

活佛在三千名喇嘛和三万蒙古人的护送下离藏赴京，越来越近。在京的喇嘛们竭力劝说皇帝去边疆远迎活佛，皇帝被他们聒噪得难受，便想外出作两个月的旅游，顺便接回这位佛界黄教的首领。沙尔推心置腹地劝告皇帝免劳此行，而且成功了。皇帝决定不出京师一步，而改派一位崇信喇嘛教的表弟为代表去边疆迎宾。

直到活佛入城时，皇帝也未亲自出迎，只派人列队示礼。队伍中有穿戴整齐的喇嘛僧和手持宝石节杖法旗的典礼官，僧人们遮道焚香，诚意

相迎，皇帝只派他的叔叔作为代表去欢迎神王，这是在十一月的一天。喇嘛教那些被认为有超自然能力的怪异礼节和仪式，很容易诱惑和使人迷信，而一般人对于这种呆板的驯化和充满性爱刺激的宗教也颇感新奇和笃诚，易于接受。

达赖活佛进城的场面蔚为大观，而皇帝却躲到树林里去打猎。皇帝没在皇宫内而改在打猎地点接见了这位神王，他在御椅上起立，上前拉住神王的手以示最高的礼遇。达赖壮起胆子，提出要当皇帝的法师，借以提高喇嘛教的地位，并且宣称只有借助喇嘛的法力才能驱除诸恶和祐助皇帝的平安。

皇帝对达赖的要求置之不理，他先请活佛去休息，以消除数月的旅途劳顿，然后馈赠厚礼请其返回。

喇嘛们曾预言，达赖的来访会带来财富和幸福。可是神王刚走，中原就发生战争，紧接着天花流行，饿殍遍野，水灾频仍。大批百姓无处避难而死于非命，导致大量的田园荒芜。于是，皇帝对达赖喇嘛在北京时受到那种神灵般崇拜的做法感到后悔，认为这些人间惨剧都是天的谴责。他下令从国库拨出一百五十万两黄金，对灾民进行赈恤和救济，借此弥补自己对达赖神王礼遇过厚的过失。

有一天，皇帝坐在耶稣会院内的树荫下，恰逢有一个身穿满服的五岁小男孩跑过来，对皇帝先认真地鞠一躬，然后行三跪九叩大礼。皇帝觉得十分有趣，便打听这是谁的儿子。

“陛下，这是我的侍从潘尽孝的儿子。”

懂事的孩子引得皇帝十分高兴，竟因此而赐给教子有术的父亲一个宫中职位。另外，皇帝还让沙尔认这孩子为干孙子，说这样就会有人照顾沙尔的晚年并继承名姓。善良的沙尔应允了此事，朝廷甚至为此专发一文，写道：“鉴于汤若望终身不娶的诺言，其生活上无伴侣，孑然一身，皇帝准其过继一个干孙子。”云云。

这个干孙子也按中国惯例改姓“汤”，名叫“汤士宏”。

汤士宏的父亲被皇宫委任为兵部的官员，从沙尔的侍从地位而一跃登天。此人善于见风使舵，从此骄横无礼，看不起耶稣会的人，他的无礼举动使沙尔蒙受了许多的不白之冤。

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时，德国传教士兼历史学家郭施拉曾评价沙尔：“他虽无尚书头衔，却是中国最能干的尚书之一。”

皇帝给他的这位顾问加朋友封了一堆头衔。1651年，沙尔已官居太仆寺卿，不久又改太常寺卿。1653年，皇帝又发给他一张印有龙纹的极精



美的敕书，上面用金字写道：“赐号通玄教师（德文原意为‘揭开天文秘密的大师’）”，敕书下方加盖有玺印。

敕文是派字迹秀美的人书写的，内容是：“尔汤若望来自西洋，精于象纬，闳通历法。徐光启特荐于朝，一时专家治历如魏文魁等，实不及尔。但以远人，多忌成功，终不见用。朕承天眷，定鼎之初，尔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又能洁身持行，尽心乃事。今特赐尔嘉名，俾知天生贤人，佐佑定历，补数千年之厥略，非偶然也。（由于你完全完成了你的工作和在科学方面的成就，你的名字将在以后的官方文件内永存，这对你是无上荣耀之事，这就是发布此件的目的。1653年4月2日。）”

对于“通玄教师”这一称号，教徒和非教徒都不是单纯从天文学角度去理解，也从宗教角度予以理解。

1657年，亚当·沙尔复加官通政使，这无疑极大地提高了他的地位。1658年时，他已正秩正一品，官帽的顶子上是一枚红宝石，深红色的袍服上用金线绣着一只振翅欲飞的仙鹤。按照中国的官制规定，皇帝对沙尔的父母和祖先都要追封官爵。

沙尔神父的曾祖父是约翰·沙尔·封·白

尔·外得朵夫·克罗耶和莫根霍芬，曾祖母是玛格里塔·封·根莫尼，他(她)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一百五十年后，竟然能受到“璿珞”和“赵”的中国封号。其祖父约翰·沙尔·封·白尔和祖母里奥·封·艾尔德伯克姆受到的封号是“玉函”和“郎”，其父亲沙尔·封·白尔和母亲玛丽娅·赛发·封·美鲁德受封为“利国”和“薛”。在北京新盖的天主教堂，皇帝赐碑一块，碑文记载着沙尔的活动和事迹。皇帝的御制碑文写道：“但若望入中国已数十年，而能守教奉神，肇新祠宇，敬慎黜洁，始终不渝，孜孜之诚，良有可尚。人臣怀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朕甚嘉之，因赐额名曰‘通玄佳境’，而为之记。”碑记铭文称：“事神尽虔，事君尽职，凡尔畴人，永斯矜式。”

## 十八、“痘神娘娘”的打击

皇帝对十七岁的董鄂氏一往情深，但她已嫁给了一位满族军人。

“滥肆纵欲无异于服毒。”沙尔告戒皇帝。

然而，爱情燃起的一团欲火，足够吞噬皇帝。他既痴情于董鄂氏，甚至企图从她丈夫的怀中夺过她，而当这位丈夫训斥水性扬花的妻子时，竟挨了皇帝一记耳光。这位丈夫不堪忍受皇帝的羞辱，竟气绝身亡，从此董鄂氏更可以不受限制地与皇帝来往。1656年，天子将她娶到皇宫，并升为皇贵妃，而将原皇后贬入冷宫。皇帝与董鄂妃形影不离，甚至对朝政日益疏懒。皇帝完全沉醉在爱情里，对沙尔的道德训戒深感厌恶，佛教僧人们趁机调唆皇帝纵欲，尽管他们明知是在引诱皇帝过一种放荡生活。皇帝顺从了和尚们的调唆，脱离了耶稣宗教，从此对政事的兴趣也毁灭了，这就为太监们作祟提供了机会。太监与和尚们共同握住了宫中权力的缰绳，佛教徒逐渐占了优势。

1657年11月，董鄂妃给皇帝生了一个儿子。

三个月后，这位被立为皇储的孩子就死了，为孩子选择下葬时间是钦天监的事情，这使沙尔感到十分棘手。在中国，钦天监成为占星择吉或为死人择葬期和葬地的机构，当时主葬者是满籍礼部尚书恩格德，他擅自修改了殡葬之日。

1660年，皇帝那位年仅二十二岁的爱妻也随亡子而去，许多官员迷信地认为，她的死因是由于错选了孩子下葬时间引起的，因为那将使世间的秩序打乱了。所以，皇贵妃之死的责任便追究到了恩格德身上，说他不顾星象而擅改葬日，被判处死刑。后经沙尔为之说情，恩格德仅丢了官职而得到赦免。

然而，沙尔得到的却是恩将仇报，恩格德对其救命恩人恨之入骨。

二千名喇嘛身着华贵的僧服，为皇帝的爱妻进行了出殡。他们奏起震耳欲聋的音乐和钟声，加上各种催眠似的手式，还弄得烟缠雾绕，在四处洒水和米，这场规模浩大的丧礼，弄得人们头昏脑涨。一种早已摒弃的野蛮习惯再次复苏，三十名太监和宫女必须在下葬时遵照皇帝之命自杀，为的是跟随死人而去并在阴间为其服务。

在百姓三天、官府一个月的服丧期间，皇帝痛苦万状。他成了喇嘛们手中的工具而无法自制，他剃去头发，花了许多钱建庙，若不是皇太

后出面干涉，他差一点儿出家当了和尚。

亚当·沙尔被冷落一旁，而满族皇帝很象《圣经》里的那个亚基帕王，亚基帕王曾对门徒保罗说：“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作基督徒了。”皇帝虽然背离基督教，但心里仍受有基督的影响。

沙尔回忆起他跟皇帝关于“十戒”的谈话，当时皇帝失望地问：“一个王也必须遵守十戒吗？”沙尔答道：“这种当王的人比普通人更要守戒，因为他们必须作下边人的好榜样。”

皇帝对此深感失望：“我的力量太软弱了，我无法做到这些。”

1660年，已经皈依佛门信仰的皇帝还想安慰沙尔，他写信说：“你的信仰已广为传播，在你的努力下，天文历算也取得了成绩，你这样为国家尽责，朕怎能不高兴。你知道应该怎样治理国家，汤若望，请你到朕这里来吧，我们可以谈谈此事，请记住我的话。”

此信的弦外之音是皇帝有些后悔了，实际上是在道歉，但皇帝这番对玛法老头儿的话，使沙尔颇为失望。

沙尔此次皇宫之行成了对皇帝临终前的访问。“痘神娘娘”在皇宫里有自己的庙，因为满族人特别畏惧可怕的天花，然而“痘神娘娘”并

不宽恕这位为爱妻之死伤心已极并染上肺病的皇帝，她找上了皇帝的门。皇帝跟沙尔说话时显得十分后悔，为自己的软弱而悔愧；但并不忏悔最主要的过失。皇帝盘算着自己死后，要立一位表兄弟当皇帝，但皇太后说服他选立一个皇子为好。皇帝在弥留之际最后一次问沙尔的意见，沙尔向他推荐六岁的玄烨（皇三子）继承皇位。沙尔的推荐使康熙即位并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帝王之一。

顺治皇帝提出继承人之后，于1661年2月5日夜里十二时永远闭上眼睛，终年二十二岁。

在皇帝通往基督耶稣之路上，“十戒”中的第六戒是他无法逾越的天堑。尽管他内心崇尚基督学说，最终未信教的原因是他无法约束自己的肉欲。

暂时不能亲政的康熙皇帝由选出的四辅政大臣管理朝政，他们的第一项措施就是遣散了许多宫女，并废除了喇嘛和太监手中的大权。

## 十九、镣铐下

有一个叫杨光先的老头子，是个心术不正，专以诽谤为职事的家伙。这是一项很能赚钱的工作，有钱的人情愿出钱给杨光先以求得安稳，少生是非。他先后把100多个无辜者投入监狱。从1660年开始，他就为反对耶稣宗教而四处活动，连传教士们都感到自己的对手是十分狡猾和顽固的。杨光先信奉道教，因此竭力诅咒耶稣宗教，并企图夺取沙尔的钦天监职务。他曾发誓要从根本上铲除耶稣宗教。

“十字架的宗教是一条毒蛇，它散布妖言惑众，我要碾碎它的头，它的头就是汤若望。”

狐狸似的杨光先写了许多咒骂亚当·沙尔的奏折，并利用好几年的时间暗中收集材料存入档案中。

在与沙尔的斗争中，杨光先寻觅到了一个死党，就是当年那个为荣亲王擅改葬日而受罚的礼部尚书恩格德。这位前尚书反过来指斥曾救过其性命的亚当·沙尔，竟说皇太子的不合理葬日是沙尔择定的，这样就引起了董鄂妃的早逝和顺治

帝天亡，这使沙尔对此要负责任。这本属谬误已极的鬼话，但是辅政王鳌拜却相信其言。四辅政大臣分别是鳌拜、遏必隆、索尼、苏克撒哈，他们以未成年皇帝的命令掌握朝纲，其中鳌拜是首脑，他是萨满教的信徒，很容易听信沙尔敌人的诬陷，使耶稣会神甫成为受害者。

当时，死神已敲响了亚当·沙尔的门。1664年4月20日，沙尔突然因脑溢血而半身不遂，不能正常行走，连说话也含混不清。就在他丧失言语能力和反抗能力时，杨光先趁机施以打击。

他写了一本诽谤之书，取名《不得已》。9月15日，他公开说沙尔及其同伙南怀仁、布格里沃和马格拉斯、还有四名中国教徒都是煽动者，传教士们被指控犯有谋逆罪、散布谬误的道德伦理和错误的天文历算。

“我不能说，”沙尔对此诬告只能缄口作答：“因为我无法说话。”

1664年11月12日，辅政大臣鳌拜下令将在京狮工作的四位耶稣会神甫抓起来。沙尔虽然是审判过程的中心人物，但中国官府实际上是在审判耶稣宗教。

半身不遂的沙尔将念珠穿在腰带上，必须跪下来接受审问，但要有人搀扶以免栽倒。

“你要求当天文台领导人就是为了在职务权



力的保护下，毫无障碍地修建教堂，传播十字架理论。”

沙尔既不反抗也无法回答，他的助手南怀仁神父出面批驳那些人的无理指责：“在耶稣会的住处，我们保存着皇帝的文件，上面记载着皇帝御批的沙尔担任天文台领导的任命。”

由于有皇帝的任命，沙尔未被戴上枷锁，但他的同事南怀仁，伯格里沃和马格拉斯却每人被九条铁链锁住。他们的脖子、手、脚上各套了三道锁链，手和脚因为勒得太紧而肿了起来，脖子上的枷锁过于沉重，使得他们坐卧不宁，只好整天趴在地上。每个被关者都有五名卫兵昼夜看守，他们天天面对皇宫跪着，又一连数小时地跪对着审判官，这对半瘫的沙尔是苦不堪言的。

审判休庭时，杨光先象凯旋者一样在京城大街上转悠，并向四处散发攻击传教士的传单；在中国的耶稣会陷入低潮。沙尔的罪名之一，就是代表一个国外组织企图发动政变，照杨光先的说法，在澳门住着三万葡萄牙军队，只等沙尔一声令下就侵犯中国。派到澳门去调查的密探根本就没有见到什么入侵的外国兵，但有钱的杨光先悄悄以四十万两银行贿，因此刑部官员不揭穿捏造者的谎言，却审判神父们并指控他们犯有谋反罪。神父们的教堂被说成是阴谋者的巢穴，作礼拜成

了聚会谋反，而受洗礼则是加入阴谋集团的手续。罪名之二，是说沙尔和他的同事们散布了一种无知的宗教，它破坏了中国传统的习惯和学说的价值，因为耶稣会神甫们不婚娶，而且背井离乡，这就是对祖宗犯了不孝不仁的弥天大罪。

当耶稣会神甫们被捕入狱时，天空中出现了一颗彗星，在中国人看来是极大的不祥之物，这是一种警告。又有一股巨大的砂暴刮遍北京，连刑部的大院里都落满尘沙。刑部因此想尽快结束审判。

沙尔的第三个罪名是传播错误的历算方法，但并未对这项罪名的内容加以审问，刑部官员就武断地进行判决。刑部判决亚当·沙尔犯有上述罪，指控他崇奉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犯罪者，还散布说这个名叫基督的人才是天和地的主人。另外，他每年收洗大约300名中国人，宣传天空本身并非上帝，但天空是上帝的所在之处，他还反对中国人以烧纸钱和上供的方式膜拜祖先。

1665年1月15日，判决公诸于众，沙尔被判决绞刑，但要在复审之后才行刑。他的一切职位和官衔均被除去，钦天监的职位落于杨光先之手，尽管杨光先的天文学知识充其量也只是个半吊子。沙尔被贬谪之后，也被六根锁链捆住，直到行刑之日，这个行动根本无法自理的瘫痪病人

只能呆在监狱里忍受煎熬。

沙尔的助手南怀仁、布格里沃和马格拉斯神父以及另三位中国教徒李、徐和潘也受到严刑拷打，每人挨一百棍，然后发配到很远的地方。为了铲除天主教，刑部下令在全国捣毁教堂，唯有沙尔的教堂幸免于难，因为那儿立有一块皇帝表彰沙尔的御制纪功碑。另外，刑部下令逮捕全国的传教士，用铁链捆到北京来。

手执权柄的四辅政大臣商量良久，最后批准了上述刑部的判决，但在两个地方稍微放宽了一些：1.教堂不必立即全部拆毁，有些可缓办。2.传教士被送北京时不必捆绑，而应较为礼待。由于要审判沙尔的第三个罪名，即传播谬误的历算，于是神甫们被象野兽一样锁了起来，并派卫兵监视他们。有些卫兵见到奄奄待毙的沙尔仍在和死神顽强抗争，不由心生恻隐，他们在夜里悄悄地从不时昏迷的沙尔的手和脚上取走镣铐，用暖和的被子裹住他衰弱的身体，以抵御寒夜。

南怀仁被突然松了绑，他接到命令从牢窗的小孔中计算下一个日食的时间和规模，刑部官员企图让神甫在这种过于简陋的观测条件下工作，以使他们在计算上失误，从而证实那些诬告是正确的。南怀仁于1618年出生于比利时的佛兰德，1637年加入耶稣会，1657年来到中国，于1660年

在天文台当了沙尔的得力助手。在狱中，南怀仁一直关心照顾着比他大二十六岁的危在旦夕的沙尔。在审判时，他充当沙尔的大脑和喉舌。南怀仁在狱内依照欧洲历算学的方法，终于测出了下一次日食，而不能言语的沙尔成了他的顾问。同时，中国和阿拉伯学者们也各依其法进行了测算。

何时出现月遮日呢？

中国天算家预告：2点15分。

阿拉伯天算家预告：2点30分。

耶稣会神甫的预告：3点。

朝内的重要官员齐集观象台上，都想弄清在中国、阿拉伯和欧洲的三种天文计算中，究竟谁属谬误者？这对正遭到厄难的耶稣会神甫来说，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一名卫兵取下南怀仁的手铐脚镣，放松了脖子上的枷锁，教士们被允许在监牢内观察日食情况。沙尔却仍然躺在牢内喘着粗气，身上捆着九根铁索，不时陷入昏迷，因此他并不十分清楚事情的进展。

真相大白的时刻逼近了。关押耶稣会神甫的监狱内也来了一位大官，负责向神甫们报告时间。

猛然间，一个站在时刻表前的人喊到：“现

在是中国人测报的时刻，2点15分，无日食发生，16分、17分、18分……”大统历的计算方法被排除在正确之外。

“现在是回回历的测报时间，2点30分。”然而，太阳上并未出现丝毫影子，失望的观察人还在等着，5分、10分、15分……。阿拉伯人也被击败了。

“3点整，现在到了你们的预报时间。”牢房内的大官盯着沙尔，他恰在此时清醒了。

3点整，第一线影子投到了太阳上，这只是神甫们的第一个胜利。影子越来越大，逐渐遮盖了整个太阳，这才是第二个胜利，因为神甫们发出的预报正是日全食，而其它学派预告的都是日半食。

邸报将神甫们的胜利消息传遍全国，大统历和回回历的天算家们被击败了。

老天爷自己作了终审判决，证实了诬告者所谓欧洲历算谬误的谎言。但是，沙尔的敌人仍不顾一切地要消灭传教士。

刑部官员们无视已经出现的事实，仍聚议表决欧洲历算学家的正确与否。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皇宫召开了御前会议，与会者有满族权贵和政府要员，计20名亲王、14名内阁官员、12名尚书和侍郎、8名军队将帅和72名高级官员。他

们按等级品位依次坐在软垫上，聚商判决欧洲历算和天文学的优劣，可他们对西方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近乎茫然。

南怀仁向上述与会诸公保证说，他将以沙尔的名义准确报出昼夜一般长的春分时间，以此证明欧洲历算法的优越性。然而，这些人就象被烫过的小虫害怕再见到火一样，他们只知谴责沙尔和他的科学。在复活节前一周，刑部宣布了这次最后的判决：亚当·沙尔的绞刑改为斩刑，但暂缓执行，而同受难者南怀仁、伯格里沃和马格拉斯则被判一百棍，而且必须驱逐出境。

鳌拜不满足一刀结果沙尔的性命，想以最痛苦的方法处死他，竟准备处以凌迟。凌迟是中国法律中最残酷的刑罚，即在人活着的时候就分割身体。沙尔将被一刀刀地割死，为延长死亡过程，还要用烙铁和热油去止血。

巧的是当沙尔的死刑判决被送到十一岁的康熙皇帝处签字时，上午十一时，天和地出面干涉了。天空中出现一颗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地上发生一次大地震，闹了三天，北京城和皇宫晃得象一条海上的船。监狱的墙被破坏了，卫兵们吓得惊慌万状，房屋在强震中象纸牌一样成片坍塌，向外逃散的人们木然地走在瓦砾之间。土地象伤口一样绽开大裂口，城墙多处毁坏，火灾

四处蔓延。尤其令人可怕的是，一股飓风夹带着沙漠的黑云遮天盖地而来，使宫内的人们象没头苍蝇一样乱窜，这些国家的大臣、贵戚和宫女都被死亡吓坏了。皇帝的祖母带着小皇帝跑到外边，住在瓦砾间的帐篷内，年老的皇太后哭着说：“这是天谴啊！”

在这些悲惨的日子里，无论是沙尔的敌人还是朋友，都成为天谴的受害者。沙尔看到上帝伸出干预之手。

在老天爷的无情打击之下，辅政大臣们不得不退却，最后放弃了处死沙尔的念头，宣布释放他们。一直处于死刑威胁之下的沙尔，终于平安地回家了。

很多人转来对沙尔的热情问候，他们站在公正、勇敢和热情的沙尔一边。大家都认为他被判死刑是不合理和违背、扰乱社会秩序的，老天爷迫使这些恣意妄为的统治者就范，人们对此毫不奇怪。一次新的地震摧毁了仅存的四十间皇宫，这些宫殿是皇帝和他的祖母过去赖以存身之处。

不久，亚当·沙尔被宣布开释无罪，彻底离开了牢狱，当时是1665年5月18日。在沙尔的教堂里，传出信徒们发自内心的歌声，这是感人至深的前所未闻的赞美诗。

## 二十、“我承认”

沙尔并非不带一丝人间尘土的天使，他象一位勇敢的壮汉，有时甚至粗野得象要咬人。他没有外交家那种滑头性格，他的身躯内有一颗善良的心和深沉的情感。他有时很容易哭，耶稣受难日时，他每次都哭。沙尔性格开朗，为人诚实，正直和直言不讳。他不会逢迎拍马，在遭受困苦时，尤其可以看出他那颗高洁之心；而在他的声威颠峰时，其性格中的弱点反掩盖其美。监禁生活和半身不遂的困苦，他都忍受了过来，坦然处之，对上帝的信念从未动摇过。

在结束了这次磨难之后，他把南怀仁叫到病榻前作笔录，公开忏悔自己的罪过，并用颤抖的手签了歪歪扭扭的名字。

沙尔让南怀仁当着围拢在病榻旁的众人，宣布他的罪过：“诸位尊敬的基督司铎：如果此刻我能够亲自站在你们面前，那么我宁肯象几个月前为了天主教信仰站在法官前一样，脖子套上铁索，头被压得抬不起来，形同囚犯，而且用恭顺抬起手的方式表示我心里的悔愧。



但我不能从床上站起来，所以只能尽我所能，通过诸位向全体耶稣会士说明，我无意为自己辩护，就象七个月前在法庭上那样。为了向诸位表明我是信守诺言的，我当众承认自己在过去许多年中，曾当了一个令人厌恶的不好榜样，尤其对于我的上司，我并没有处处听从他们的劝告和提醒。另外，还要自警自劾的是，我对仆从过于迁就宽容，致使他们的骄横无礼引起耶稣会友们的极大反感，应由我负大部分责任。我违反了神的意旨，有了不少财产，更为不明智和欠考虑的行动是，我认了侍从之子为干孙子，这极大地伤害了教会内同志的神圣情感（天主教规定神父不得娶妻养子）。

我承认并忏悔自己的罪过，甘心将烧过的灰烬撒在头上，俯首认罪。我再次表明，我只能承认，我的罪过、我的罪过、我的大罪过。

尊敬的司铎们，大家有目共睹，我已是重病缠身，手足麻木，卧床不起。但我请大家相信，我真心的悔罪之情就象宁愿再次过堂受审一样。最后，我请求诸位，别饶恕我对罪过的承认，我深感为时已晚，终于导致了这场悲剧。现在上帝的手不仅惩罚了我的肉体，也鞭撻了我的心，但这是一只象父亲一样的手，是爱抚之手、恩典之手，就象上帝本人的怜悯一样，直到今天还允许

我在耶稣会里工作。我同样坚信，上帝的悲悯和你们的祷告祝福，一定会使我忍耐到底，并且庇护我于宠爱之中。阿门！

时一六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于北京  
约翰·亚当·沙尔（签名）”

沙尔这番忏悔乍听是讲自己的渺小，而实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言论。

确实，这位无助的老人在临终前的病榻上书写了历史。在他生活的颠峰时期，许多同事曾有过如下评价：

南怀仁：“沙尔对皇帝的影响比全部宰辅和贵族加起来都大，亚当·沙尔的名字比任何一位欧洲人在中国的知名度都高。”

如士莫神父说：“我相信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哪个外国人能象他那样受到皇帝的敬重、享有如此多的荣誉。”

潘国光神父说：“我们都是教会的成员，既受到上帝的恩典，也在沙尔的盛名之下享受到许多好处。”

阳玛落神父说：“我真希望我们中间能有100人和亚当一样，要让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他的同志和兄弟，这样就没人敢欺辱我们。”

弗塔多神父说：“我们都很安全地生活在亚

当神父的影子之下。”

嘎比亚尼神父说：“每个本教团或别的教团的传教士，只要说明自己是沙尔的同志，就可以自由进入中国，受到皇族成员和人民的尊重，并且被允许自由传教。”

穆尼各神父说：“皇帝对沙尔深有好感，我们得以在他的名字保护下传播福音。”

霍特神父说：“沙尔虽居上帝之下，但他却是我们每个信徒的根据地和隐蔽所。”

亚当·沙尔虽然经历了从荣誉的高峰到耻辱的谷地的历程，他却到达了作为一个伟大人物的巅峰。

## 二十一、你留下永久的荣誉

阴谋家杨光先是沙尔最大的敌人，他使沙尔一落千丈并夺走了钦天监的领导权。他还强占了耶稣会房屋；逼迫奄奄一息的沙尔搬出去。1665年11月11日，沙尔被迫迁离西边耶稣会住地，带着一身重病痛苦地搬到东边的教堂。杨光先强占了教堂后，竟下令在祭坛上挂起自己的画像。

沙尔在弥留之际十分痛苦，窒息使他的胳膊和腿都在抽搐。1666年8月15日、即圣母升天节时，沙尔溘然长逝了。“在不懈地从事了四十四年的传教工作之后，他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传教士之一，也是德国教会输送来华的最优秀人物。”这是一位历史学家的评语。

在1651年到1664年，也就是沙尔在华工作的最辉煌时代，据一位编史者统计，此期间有十万五千名中国人信奉天主教。

十四岁的康熙皇帝剥夺了四辅政大臣的权力，归政于己。以前的辅政大臣鳌拜，则因暴政和叛逆罪下狱。杨光先借辅政之机将沙尔排挤出钦天监，自己出任天文台之职仅四年，便因无能

和寡学被皇帝下令谪官贬职，皇帝起用沙尔从前的助手南怀仁代替其职。

年轻的皇帝挽回了沙尔的名誉，他宣布从前的叛逆罪，传布邪教罪和谬误的天算罪等罪名，都是强加给沙尔的不实之词，沙尔是清白无辜的。皇帝将沙尔原来的全部称号和荣誉又都完璧奉还，重新以国葬的规格厚敛了沙尔的尸体，并亲自写了表彰和感谢这位伟大的神甫兼朝廷命官的祭文。这篇御制的祭文刻在墓碑上，并在沙尔墓前宣读于众。

这篇等级最高的祭文的内容是：

“皇帝谕祭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事，故汤若望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卹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习天文，特畀象历之司，爰锡‘通微教师’之号。遽尔长逝，朕用悼焉，特加恩卹，遣官致祭。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有所知，尚克歆享。”

（原文时间为康熙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即公元1669年12月8日）

康熙皇帝为了纪念他父亲的朋友汤若望，并在国内熄灭迫害传教士的邪火，下令将驱赶出境的传教士们请回他们的教堂。

最后，皇帝为亚当·沙尔的全部贡献加冕，

发布了一个著名的自由通告——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公开允许福音无限制地在中国大地上传播。

## 关于《通玄教师汤若望》

各不同国度、地域、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世界文化史的重要研究内容；因为这种交流是推动和提高世界文明程度的巨大动力。中国的明末清初时期，正是世界各国、又尤其是东西方各国开始广泛接触的重要历史时期。东、西方不同文化的交流、吸收和融合，当然也有相互排斥和斗争，不仅促进了各国文化的发展，也提高了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水平。汤若望即生活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并且在**中德友好交往的历史上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汤若望是一位德国传教士，更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他在数学、物理学、建筑和铸造等学科中也有精深的造诣。关于他的治学特点和突出贡献，用中国顺治皇帝所赐的“通玄教师”封号也许更能说明问题。“通玄”即通晓天文学的意思，而“教师”在中国更是一种美称，尊师重教在中国是有古老传统的。汤若望来华时仅是一个青年人，在中国度过了四十四年，把毕生的精力和才智贡献给了他的第二祖国——中国。

在汤若望逝世355年后的今天，我有幸来到中国学习和研究历史。作为汤若望的同乡，我对这位伟大的德国天文学家和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先驱人物充满敬意，对他的传奇般的事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一本德文最新版的《通玄教师（德文直译为“揭开天文秘密的大师”）汤若望》，这是一本兼有科学性和趣味性的小册子。该书作者引用了许多现藏于德国的有关档案和图片，这对于暂时还无法利用这批档案的中国学者是有参考价值的，同时由于作者通俗流畅的文笔，使一般读者也易于接受。出于向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和人民推荐介绍这位伟大历史人物的目的，我产生了翻译此书的想法。但由于我来华学习时间还短，用中文表述这本德文行文优美的作品还有相当大的困难，因此我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张晓虎老师为合作者。经过我们一番艰苦努力，终于使译文脱稿，至于译文的典雅流畅，这当然要感谢张晓虎老师的文字功力。这本小册子在翻译和出版过程中，先后得到戴逸、罗明、王俊义老师的多方关心和支持，特别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魏永昌副教授仔细审阅了全稿，才使这本书能够完整准确地介绍给广大中国读者。在此，我谨向诸位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这种合作也应该说是中外文化交



流的一个成果，其意义也许超过这本书。

由于本书作者是西方国家的人，因此在讲述中国史事时会有一些失误和欠妥之处，尤其是用“盗贼”等字眼描述农民起义，更是很不合适的，但本着忠实于原著的翻译原则，我们还是如实译出，因为我相信现在的广大中国读者是能够予以理解的。谢谢！

达素彬

1988.10.30.北京

## 传教士中英文姓名对照表

Alenda, Gaspar	嘎斯帕·阿伦达
Aquaviva (Jesuitengeneid)	阿夸维瓦 (耶稣会总会长)
Bell, Adam Schall von	汤若望
Brancati, François	潘国光
Buglio, Ludwig	利类思
Dias, der Aeltere	李玛诺
Dias, der Jüengere	阳玛诺
Dios, Francisco de la Madre	弗朗西斯科·德的奥斯
Dunne, George H.	乔治·杜耐 (历史学家)
Ferdinand, Herzog von Bayern	斐得南·巴燕公
Figueiredo, Rodeneh	费乐德
Furtado 傅泛济	François
Gabiani	果嘉
Galileo, Galilei	迦利略
Guetzlaff	郭施拉
Kepler, Johann	哥白尼
Longobardi	龙华民
Magalhaes, Gabriel de	安文思
Maximilian I., Herzog von Bayern	马克西米良·巴燕公

Pantoja, Jacques de	庞迪我
Rho, Jakb	罗雅各
Rhodes, Alexaner de	阿列克山大·奥代斯
Ribeiro, Melchior	黎伯度
Ricci, Matteo	利玛竇
Rinaldi	瑞乃尔第
Roth	罗特
Rougement	鲁日蒲
Schneiber, Hermann	赫尔曼·舍海巴(历史家)
Semedo, Alvare de	曾德昭
Smogulecki	穆庄各
Terrenz, Jean	邓玉函
Trigaué, Nicolas	金尼阁
Ursis, Sabbathin de	熊三拔
Vagnoni, Alphonse	高一志
Vrbíest, Ferinand	南怀仁

### 本书参考资料

#### 一、照片:

1. 奥地利耶稣会(维也纳)的杂志《天主教传教团》(这些杂志现存于德国弗莱堡)。
2. 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的照片档案。
3. 柏林艺术与历史档案馆。

#### 二、文献参考书目:

1. 《出色的榜样》斯图加特1965年

2. 《天的官员》汉诺威1954年
3. 《在耶稣会神父汤若望领导下的中国传教团的历史》维也纳1834年。
4. 《汤若望》科隆1933年
5. 《中国天主教传道团的历史 始末》第一册，维也纳1895年（出版单位是天主教的书会）
6. 天主教弗莱堡教会藏：
  - A. 《汤若望神父，在中国的传教士》
  - B. 《北京与河北地区的传教会，从其十六世纪建立至今天》

